

第九十期 第九卷

敵後解放區特輯

群 衆



三十三年十月五日出版



紀念「雙十」三十三週年 (代論——免登)

悼念民主戰士韜奮先生

韜奮先生事略

專論

人民的世紀

◆敵後解放特輯◆

活躍於敵後戰場的民兵
百鍊成鋼的晉察冀解放區
戰鬥中成長的晉綏解放區
新山區的成長
華中解放區的對敵鬥爭
活躍在珠江三角洲的游擊隊
瓊崖仍是我們的

研究

論文學中的人民性的問題(中)

讀報雜感

從中國基地下手

從西南戰局說起

使盟友的援助不是虛擲

霉布及其他

從對學生的所謂「優遇」說起

潘梓年

本社 (八三三)

(八三三)

鄧初民 (八三四)

八路軍總政治部 (八四〇)

孫元範 (八四三)

(八四九)

侯森 (八五四)

(八五八)

張樾 (八六一)

張樾 (八六一)

A·蘇菲亞作·文藝雜感 (八六三)

黎華 (八六九)

敏 (八七〇)

爾芝 (八七一)

卓芬 (八七二)

黎華 (八七四)

悼念民主戰士韜奮先生

本社

韜奮先生於七月二十四日因病逝世了！這一噩耗的傳來，帶給了我們以無限的沈痛和悲哀！這因為韜奮先生的死，不僅是中國進步文化界的一個重大的損失，也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事業中的一個重大的損失，特別是當今天抗戰已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爭取民主已成爲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時，我們不能不意識到這個損失，對於我們是怎樣的深重；我們不能不想到先生之死於「長期慘苦的病痛」與「顛沛漂零」，而引爲痛心！

韜奮先生以一生的精力爲民主、爲進步文化、爲抗戰、爲民族團結而奮鬥，可說是一位「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意志堅強至死不渝的戰士。他的「生平志願」，只是要做一個大公無私的爲正義奮鬥的「新聞記者」；他本人「並未加入任何黨派」，但對於政治時，他却有着光明磊落的與正確的「立場和主張」，並且爲了這些「立場和主張」而奮鬥到底，這我們從他二生的事業中，俱可以看出來。

還從民國十五年接辦「生活週刊」時，他就開始實踐自己的主張，將這個刊物「漸漸轉變爲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與以）迎頭痛擊」，並且爲了應付時代的要求，將刊物的內容「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出發點了」，因此使得「生活週刊」的銷路，從兩千多份擴至十五萬份，變成了一個廣大人民愛讀的刊物。先生的這種精神，同樣地也表現在他後來所主編的「大眾生活」、「生活日報」、「全民抗戰」以及港版的「大眾生活」等刊物中。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韜奮先生意識到國難的日益嚴重，專業文字的呼聲已經不夠，乃逐漸由言論轉入於行動，（被略）募款援助東北將士抗戰及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被略）後又積極參加文化界的救國運動，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小冊子，（被略）他的鬥志，與抗戰的決心更加堅強了。

「七七」抗戰發動後，先生在武漢與重慶兩地先後編輯「抗戰三日刊」

與「全民抗戰」，爲爭取抗戰與團結而奮鬥；同時還參加了參政會，慷慨陳辭，力爭民主自由。三十年春先生（被略）由渝赴港，再創辦「大眾生活」，爲爭取民主自由而呼籲。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先生又避入內地，懷着苦痛的心情，輾轉遷徙，參加了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工作，而這時病魔已在殘害他，終於造成他的死。當他在病痛的期間，他還是時時刻刻以國事爲念，在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病中所寫的「對國人的呼籲」一文中，開頭就有這樣的話：「我已處在長期慘苦的病痛中，環境的壓迫和耳痛的磨折，都可用我堅強的意志與之抗爭，還能泰然處之，但每一念及祖國的前途，則憂心如搗，難守城默……」只從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知道先生的焦慮和苦痛了。

韜奮先生在他一生的生活中，言論中，行動中，永遠都是以人民大眾和民族的利益爲前提，並且永遠認爲人民大眾與民族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做一生的言論和行動，是以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爲立場，他替人民發言，他爲人民鬥爭，而從自己私人的一切於不顧。先生告訴我們，當他主編「生活週刊」時，他意識到「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着密切的聯繫，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幾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於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這個刊物就「由個人出發點轉到集體出發點了」。當時每期的「小言論」都是由先生執筆的，他又這樣寫道：「每期的小言論僅數百字，却是我每週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爲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先生一生中都是堅持着這個立場，他「只知道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采，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他對於自己的崗位，「對於自己的職務，不肯一絲一毫的拆爛污，他同時卻不願忍受不合理的侮辱」。當他講起他自己政治態度時，他說過：「我向來並未加入任何黨派，我現在還是如此」；「我服務於言論界者十幾年，當

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先生們這種「立場和主張」，就是中國優秀的進步的人民的「立場和主張」，不幸先生就在「環境的壓迫」之下為這種「立場和主張」而殉道了！

講道民主的主張和團結的意見，先生永遠是以民族的利益為依歸的，這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先生所寫的一段文字中，就這樣講過：「我們應該格外努力的是：一方面要從種種工作上更充實團結奮鬥的內容；一方面要利用種種方法督促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忠實執行，對於民衆救國運動的民權有切實的保障，正所以增加全國一致救亡的力量，所以這兩方面實有密切的聯繫」。先生在



爭取最後勝利的最基本條件之一，也是抗戰勝利以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條件之一，而且團結與抗戰兩者是不可分離的。能團結才能抗戰。……我們必須以全國人民的力量，全國輿論的力量，全國各抗日黨派的力量，以及海外幾十萬華僑的力量，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到底！」

韋君先生二十多年來，正是爲了這種民主政治，爲了這種民族解放及進步的文化事業而鬥爭，執

知近年來，被「臥病床褥」，使得他「暫時停止二十年來幾於日不停歇的筆管」，但做還是「苦思焦慮」，「憂心如搗」，竟至逝世於「頭暈眼花」之中。

韋君先生現在這離我們而去了，從民族解放的事業上來講，我們失掉了一位堅毅的爲民族團結與民主自由而戰的戰士；從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們失掉了一位可敬的青年導師。但是先生一生的事業並不是徒勞無功的，他用他的文字和行動，教育了我們；他用他的心血，堅定了我們對爭取民族解放與爭取自由的信心；爲了拿起他已經擱下了的筆，爲了重新踏上他還沒有走完的路，我們應該記着他病中最後向國人的呼籲，來發揮它！來實現它！因爲在這個呼籲的最後完全實現中，是永遠活着他不朽的精神！

去年所寫的「對國人的呼籲」中，又指出「民主政治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最寶貴的遺產，也是全國人民所最熱烈希望實現的目標。民主政治同時又是堅持抗戰精誠團結的最基本條件之一」。我們應該珍貴民主主義，努力實現民主政治！

(被略一大段)

講到民主團結，先生認爲「以國共合作爲中心的全國各抗日黨派的團結，是發動抗戰堅持抗戰和

韋君先生事略

韋君先生，名恩潤，原籍江西南昌人，生於辛亥前十七年九月。曾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小，中學及大學讀書，後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民國十五年冬，參加「生活週刊」的編輯工作，後任主編，並手創生活書店。「九一八」事變後，曾奉勸援助東北將士，後出國，游歷歐美等地，並曾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讀書。復國後，先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後回上海主編「生活星期刊」，參加文化界救國運動，(被略)。「七七」抗戰發動後，先在漢口創辦「抗戰三日刊」，繼在重慶創辦「全民抗戰」，並參加參政會，爲爭取民主自由而戰。民國三十年春，去香港，主編「大眾生活」，爲民主抗戰，奮鬥不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陷落，又避入內地，轉徙蘇北。一年前，突患耳炎症，轉變爲耳聾，竟於本年七月二十四日不治逝世，享年五十。遺妻及子女三人，其中子二，女一。先生生前曾主編「生活」、「大眾生活」、「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等刊物。著譯甚豐，重要者有「萍蹤奇話」、「萍蹤憶語」、「坦白集」、「展望」，經歷「革命文豪高爾基」及「蘇聯的民主」等三十餘種。

人民的世紀

鄧初民

社會發展的歷史，基本上就是物質財富生產者本身的歷史，亦即人民大眾本身的歷史；或者說歷史就是由人民大眾依循着歷史自己運動的規律創造出來的。但人民創造了歷史，而歷史的過去紀錄上，却只有過奴隸主、封建領主的世紀，資本財階的世紀，一言以蔽之，却只有過「暴君、獨夫」的世紀。一直到今天，人民才從「暴君、獨夫」的世紀，慢慢翻過身來，推翻它，粉碎它而自立自己的世紀；這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的「人民的世紀」。

「人民的世紀」的實質意義，是人民一面在創造歷史，一面就在支配歷史，他是歷史本身的真正創造者；同時，他就是歷史本身的真正主宰者。爲着人民大眾其真正的永久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人民有最高和最後的號令權；不待說，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可以管理國家，組織政府，起碼可以自由選擇政府。大西洋憲章第三條決定「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此即人民可以自由選擇政府之公開宣言；此外，羅斯福所標舉之四大自由，已經深深印在全世界愛好自由人民的腦海中，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吉爾吉爾宣言意大利人民「什麼是自由」的問題，又標舉七個重要標準：一、人民是不是有自由發表言論反對批評他們政府的權利？二、人民是不是有權推翻他們所不贊成的政府的權利？人民能不能合法得到實現他們意志的立法方法？三、人民的法庭能不能不受行政力量的干涉？四、這種法庭能不能執行在人類心目中看作與守體、公正兩大廣泛原則相符合的公開而穩定的法律？五、無論貧富或私人及政府官吏是不是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六、是不是每一公民對他的國家應該負有的各種權利，都能够永久維持，保護並且增強？七、是不是普通自食其力維持一家生計的勞工都能够避免一黨控制下的秘密警察組織的威脅（如法西斯納粹的政治警察就是一例）？這七個標準，是自由與不自由

的標準，同時，也是法西斯與民主的標準，更是否「人民的世紀」的標準。在「人民的世紀」裡，一切是人民在號令，再不是暴君獨夫或政府在那裡發號施令；是人民大眾爲着他們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再不是政府，尤其不是暴君獨夫爲他們的私圖，要人民跟着他們走。總之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在人民手裡。

是的，就是在過去的世紀中，暴君獨夫的命運，也未嘗不決定於人民，「秦爲無道，二世而亡」，即其例。然而那時人民之決定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命運，是消極的，被動的，不自覺的，暴君獨夫不顧人民大眾的死活，激起了人民反抗的反抗，去了一個暴君獨夫；又來一個暴君獨夫。今天人民之決定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命運，是積極的，主動的，自覺的，政府不能跟着人民走，激起了人民不能忍受不自由之自覺的憤怒，人民就要把這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永遠拋掉而歷史的過去掃去，使它再也不能死灰復燃。

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人民在那裡發號施令；爲着人民自己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裡；人民積極的、主動的、自覺的排斥、推翻那些違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這便是「人民的世紀」及其主要的基本的特徵。這也便是「民主主義」或「民主」的基本的主要特徵。

不過並不是歷史上有了形式上的民主主義，即由法律條文所表現的民主主義，歷史上便有了「人民的世紀」，如說「近世各國所謂民主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則顯露形式上的民主主義與真正「人民的世紀」之不相符。而真正的民主主義，必需對實質的「普遍平等」的。真正的「人民的世紀」，必需所謂民權，是爲「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少數人所獨有」。民主主義的發生已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如從十六世紀

後半期(魯爾的民主革命算起)，而真正的民主主義，或者說新型的民主主義——從國內的民主發展到國際的民主，從政治的民主發展到經濟的民主的民主主義，亦即真正的「人民的世紀」，實在說起來，只是在最近幾十年內才發其端(約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而把人民的粗壯身體鍛鍊得更加強固，人民的熱心腸煽動得更加熾熱，人民坦坦自若地正義感和人類同胞愛，激發得更加坦坦自若地天良，是黑暗地打破它，是敵人就消滅它，有胆有識的劃分時代，有極有力的支配歷史，有勇有謀的對付那些暴君獨夫和違反人民利益的政府，而最後決定他們的命運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真正的「人民的世紀」，怕還是空前的慘酷的暴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亦即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烽火所支付的幾千萬人民的血汗的重價的產物吧！

歷史上暴君獨夫的世紀，人民與政府的關係，顯然是不一致的——兩極的，對立的——一邊是奴隸主人，一邊是奴隸；一邊是封建領主，一邊是農奴或農民；一邊是資本財閥，一邊是僱傭工人。但任何與人民不一致的政府，却都自命為「奉天行道，仁民愛物」的政府，自命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同時把社會、國家、民族等等，也偽裝成粉飾為和諧、平等、黨派利益衝突之整體，而政府則尤為超於此整體之上的全權者。這是一種偽裝的粉飾，使得今天有幾國國際觀察家到，在觀察某一國家時，總不能對某一國家和其政府與人民分別來看，而把某一國家的政府就代表某一國家的人民，如把希特勒代表整個的德國，或把某些國家政府的無能，反動，不民主，對反法西斯任務的不積極，這真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但顯然的今天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陣營內，尤其是歐洲各國佔領國家，如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等國政府，雖早經離開國土，流亡在倫敦或開羅等安全之地了，而南、希、波蘭等國的人民，却一直在水深火熱中，不屈不撓的堅持着反法西斯匪幫的游擊戰。

然而暴君獨夫的偽裝、粉飾，決不是徒然的。他們會用種種花言巧語，把自己裝成代表一切公斷一切的總體，同時，也把自己神化為「替天行道」的超然象徵，這樣便來掌握了人民的全部命運，迫使人民無條件的跟着他走，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來對人民發號施令；而又不對人民負任何責任(只對天或上帝負責任)，人民在這種條件下而起的

反抗時，就是「造反」，就是「叛逆」，就是「犯上作亂」。這種情形，在歐洲歷史上，只有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英國人民英勇的把英國國王查理第一的死刑；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人民英勇的把法國皇帝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以後，這才不客氣的揭穿了暴君獨夫的偽裝、粉飾；這才鮮明的把歷史倒轉過來，人民要讓政府以責任，人民不僅有權批評，反對政府，人民還有權推翻他們所不贊成的政府——即人民有權革命。自此以後，來革命的風暴已雲湧了。在歐洲歷史上，一九一一年，中國人民也揭開了滿清政府，這批人民起來要求政府與人民真正的一致，不許偽裝，不許任何政府都代表人民自己的政府，至少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如果代表人民自己的政府或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就不要他。這就是「人民的世紀」和「暴君獨夫的世紀」的不容混淆的界線。

不過如前所說，這種真正的「人民的世紀」，不是一開始就把人民的利益表現得那麼大結實，只在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烽火中，才在支付了幾千萬人民的血汗的巨額犧牲中，人民壯大結實的力量，才在每個新的暴君、獨夫——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傢伙的面前，經過這太深刻不容磨滅的考驗。不要說，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要由人民那裏發號施令；不要說，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掌握在人民手裏；不要說任何政府都跟着人民走，不管你是忠實的或是虛偽的；不管你是貴族的或是被動的；如果你能跟着人民走，你就能生存；否則便只有被歷史丟棄你的名字。看吧！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率直的，公開的，為着這頭號軍火大王，鋼鐵大王等少數人的利益，站在與本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相反的方面，張開血口，掠奪貧民，企圖奴役全世界，建立法西斯匪幫的帝制，他個當然只有自取滅亡，自絕於人類，今天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乃至日本國的人民，正以雷霆萬鈞之力，進行撲滅法西斯匪幫的工作，墨索里尼已經會台了，希特勒的末日(有人估計在本年內)也迫在眼前，日本強盜的命運，又何能久延？

最近(一九四四、八、二十五)羅馬尼亞對德宣戰，同盟國投降，開始了法西斯匪幫附庸國的解體，緊接着是保加利亞向英美提出議和，匈牙利也在改組政府，顛覆政變，整個巴爾幹，在紅軍勝利及其本國人民壓迫之前，表現出極不穩定的騷亂失措，北歐一角的芬蘭，本早應動搖，但還在掙扎；從本年九月五日正式提出要求蘇聯休戰，也就是到了不能不作最後決定(降神

即降)的時候。尤其是目前接二連三大串的消息，都是法內地軍起義，佔領巴黎，推選等中心城市，貝當、賴伐爾傀儡政府解體，比利時、荷蘭、以至挪威的法西斯統治，在人民英勇反法西斯鬥爭面前發抖，又是什麼德法西賊匪魁，春利安多尼哥哥等，在在都證明着人民的力量之不可侮。

人民的力量及其與政府的關係，表現得最明顯最富於諷刺性的，是歐洲被佔領國，例如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等幾個國家。他們自國土淪陷之日起，即不願生死的，堅持着地下反法西斯鬥爭，艱苦的，百折不回的把國內各階層各黨派各種族和民族各宗教派別的民主勢力，團結起來形成龐大有力的游擊軍，終於組織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與反動的遠反人民利益的流亡政府相抗衡，迫使他們要生存就只有限着人民走；否則便只有長期的永久的榜徨飄蕩於國門之外。

此外還有墨索里尼垮台以後的投降盟國的巴多格羅奧政府的遭遇及其崩潰過程，也表現了人民的力量是最後決定者；同時，人民是不可能長久被欺騙的。因為以半法西斯裝出現的巴多格羅奧終於被人民趕走了，這都是一面一面亮晶晶的鏡子，值得一切遠反人民利益或裝模作樣、希、波流亡政府，乃至巴多格羅奧政府者，引為殷鑒。

我們先從南斯拉夫說起。南國在被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的閃擊戰打垮以後，國土淪陷，人民饑餓，彼時除與德寇勾結的陸軍部長米海洛維奇外，南國政府即流亡在埃及首都開羅。三度連任南國流亡政府軍部長的米海洛維奇，自然是南國最卑劣的民族叛徒，他在南國與德寇勾結外，并專門襲擊人民抗戰的勢力，即由南國地下發展起來的游擊軍。南國的游擊軍，最初當然是一支不大的人民軍隊，可是由於米海洛維奇的正視領導，雖然受到納粹軍隊與米海洛維奇軍隊的內外夾攻，反而一天一天成長和發展起來了，最近他已發展到更爲龐大而與蘇聯的南勇紅軍會師。只有他們才是認真從事爭取自己祖國獨立自由的人民力量，而對反法西斯的貢獻最大。據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報告：「他們所抗擊的敵人的數目，要比美協第五軍和英軍第八軍在意大利抗擊的敵人多得多。」因此，在去年(一九四三)十二月間就成立了以鐵托元帥爲主席的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便是雛形的南斯拉夫臨時政府，它團結了各社會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各宗教的民主力量；它頒佈了保障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各種權利的民主憲法；它建立了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聯邦制度，它是新型的民主主義的政權，也就是全黨人民大眾的政權，這種人民政權的政府當然就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由於人民自身力量的成長和發展，南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不僅得到本國全體反法西斯侵略人民的支持和擁護，而且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人民及其代表人民的政府所支持和擁護。蘇聯是不待說的了，英美也一天天的認識了它的力量，表示

和它密切合作，給以積極的援助。自去年(一九四三)七月起，英美就正式承認了南國人民解放軍。此後英美蘇三國與南國人民政府互相派出了軍事代表團，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和接觸。而南國流亡政府呢，却一直袒護人民公敵米海洛維奇，反對人民愛戴的領袖鐵托，甚至做了納粹或希特勒的應聲蟲，硬說南國人民解放會議(南國臨時政府的前身)是蘇俄埃政府，硬說南國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軍。這樣與南國人民利益不一致的政府，甚至與人民爲敵出賣南國人民利益的政府，當然要爲人民所拋棄，只好徘徊於國門之外。但他們還死不甘心，一時不肯放棄高高在上的政府地位；然要辭職政府地位的存在，就得跟着人民走，不啻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最後才由南國國王彼得出面，毅然決然改組流亡政府，以剛從美國回來的蘇伯西奇組織新內閣，而蘇伯西奇担任組閣的條件，就是罷免米海洛維奇的陸軍部長。并聲明：「任何流亡政府，如不能獲得在祖國領土內奮勇抗戰的人民的承認，即不能成立。」在新閣組成後，蘇伯西奇本人立刻到祖國領土內解放區去和鐵托元帥會商合作的辦法。蘇伯西奇與鐵托在今年(一九四四)六月十六日簽定了協定：規定南斯拉夫現政府(亦即流亡政府)必須以進步的民主分子組成，必須以幫助人民解放軍爲任務，南國臨時政府和流亡政府，共同任命一種機構以合作抗戰，並儘速成立單一政府，至於國體問題，則留待將來人民作最後決定。這證明了什麼呢？恰恰證明：「人民的世紀」，政府要跟着人民走，才能生存，暴君獨夫或政府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裡；人民積極的主動的自覺的排斥、推毀那些遠反人民利益的暴君獨夫或政府。

其次，我們說到希臘。希臘自淪陷後，人民的勢力，也在他們自己艱苦奮鬥中成長。代表這股勢力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是在納粹軍進攻佔領希臘後一兩個月便成立了的。它的目的是不靠卑劣無能的政府，反抗法西斯侵略，解放祖國希臘，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它也同一般地下運動一樣，首先組織了人民自己的游擊隊，漸漸發展爲人民解放軍，在極端艱苦危險的環境中，反抗打擊法西斯侵略者；它組織、團結各社會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各宗教的民主勢力，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因此，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便在人民大眾的支持和擁護之下，很快的就進一步發展爲希臘的臨時政府。但希臘在被佔領後就出亡在英國倫敦的流亡政府，對於這些留在祖國領土內抗戰的人民力量怎樣呢？他們不但不支持，贊助他們，反而忽視，甚至仇視他們，試看正如吉里摩柯斯所說：「整個解放運動，不但被忽視，而且被阻礙着。在國外，對於自由而奮鬥的英勇戰士們的目的，竭盡造謠誹謗的能事，說他們的目的是陰險的，無政府的。」這不以此，希臘流亡政府並拉攏一部分在國內乘仗劫掠的盜匪式的游擊隊，來反對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下的解放軍，造成內部摩擦，幫助敵人，這種下流的把對內看做比對外更重要的

政策，真是一個「可嘆的政策」(「倫敦論壇報」指稱希臘流亡政府)。

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的，與人民為敵的流亡政府，自不免為人民的力量所拋棄。在為人民所拋棄的時候，希臘流亡政府也和南王彼得一樣，終於被迫不能不開始改變自己的作風。希臘流亡政府，在不長的時間，曾經過兩度的改組；最後，著名反動的維尼希斯內閣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提出辭職，希王另行任命社會民主黨領袖裴德里斯歐組織新閣，新閣組成後，裴德里斯歐，即於本年五月下旬和參加希臘臨時政府的各黨派在塞巴嶽山舉行會議，以謀全國的團結合作，在會議未舉行前，英外相艾登五月十日在英下院報告，對於這一會議，寄與無限希望。他說：「希臘內閣總理將與各政黨和抗戰組織舉行會議，旨在設立國民政府，充分代表愛國分子的意見，英政府將希望希臘總理能順利促成基礎鞏固的政治團結。」這種會議的目的，原是代表希臘人民利益的各黨派所一向要求的，他們必然會一致擁護這種會議的圓滿成功，所以參加會議的共產黨代表盧斯等首先向英相提出保證：「我們決將竭盡全力，以求民族統一目標的實現」，會議的結果，據倫敦太晤士報說：「至少已成立了友誼的保證」。但據最近所傳：裴巴嶽會議之後，希臘政府及國王，仍是一再揮霍財力，形成了目前僵持之局。按照裴巴嶽協定，國王和首相，在國民公決是否要他們回國之前，不得回國；可是現在希王又在說他在考慮是否將在公民投票之前回國了，這是僵局的原因之一；其次，希臘流亡政府，依靠其他方面的幫助，把國外的希臘海陸軍人中贊成民主，贊成代議制的人大批逮捕，打算恢復舊觀的王公大臣們，正在作最後努力，企圖使人民無法掌握自己將來的命運，這自然要造成目前希臘團結反法西斯共同任務的障礙。但兩國及整個巴爾幹都已是人民戰勝一切大放光明的今天，希臘流亡政府最後也只有跟着人民走才能生存，否則也是只有長期的永久的徬徨歸於國門之外。

再其次，我們說到波蘭，波蘭是被希特勒的閃擊不到兩個禮拜就打垮了的一個國家，它一被打垮，波蘭流亡政府一溜煙的就跑了。他們雖然沒有向希特勒投降——雖然也還有如薛戈爾斯基總理的抗德反納粹分子，然而其內部却存在着一個與希特勒有聯繫的對外反蘇對內反人民的強大集團，這個集團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而日益抬起來，以壓力加在波蘭總理薛戈爾斯基身上，迫使他逐漸放棄反德親蘇政策，甚至轉而採取對蘇嫉視政策。一九四二年，波軍統帥部曾經拒絕了把在蘇境內組成的波軍調赴前線作戰；波蘭政府曾經吞併了蘇聯關於救濟波蘭難民的巨額貸款；駐蘇波蘭大使館和波蘭軍事代表團曾經利用了蘇聯各地設立的機關，進行破壞蘇聯的間諜活動。一九四三年，則在希特勒一手製造的「卡特森林波蘭軍官萬人塚」案之下，硬說這些波蘭軍官是蘇聯殺害的，來與希特勒共同進行了這個醜惡的運動。

到了今年(一九四四)一月五日，正當蘇軍打出國界直指波蘭重要城市畢夫的時候，重新提出蘇波邊界問題，發表「波蘭從未承認且不願承認由武力造成的解決」的聲明，而在另一面蓄意進行一種強烈的侮視蘇聯的「東歐聯盟」運動，但不幸的是，波蘭流亡政府一切反蘇的企圖，都不免歸於徒勞，今年蘇軍在東線的成就，已一天一天的使波蘭獲得解放的日子迫近起來，波蘭人民為祖國的解放而作的國內外的鬥爭，已獲得蘇聯熱情的援手。

去年(一九四三)在蘇聯境內已成立了「波蘭愛國者聯盟」，並編組了在蘇聯戰場上與蘇軍並肩作戰的波軍，波蘭境內也已組織成立了全國會議，亦稱「國民會議」，團結波蘭所有各階層，各黨派，各宗教，各民族的力量，來加速希特勒的崩潰和波蘭的解放。參加國民會議的計有波蘭農民黨，波蘭社會民主黨，波蘭工人黨和其他民主性質政治團體的代表，這個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國民會議代表團，今年五月到達了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和人民一致熱烈的歡迎，而這個在波蘭境內的代表波蘭全國人民力量的國民會議，且於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宣佈成立民族解放委員會，向人民提出民主政綱，並任命波軍總司令格爾蘇軍作戰，準備政綱，以保障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自由，嚴懲一切法西斯罪犯，進行土地改革，復興農村與改善人民生活為任務，外交方面，提出明確的聯蘇政策，根據蘇聯協定締結緊密的聯盟，同時，和英美保持傳統的友誼，並與一切民主國家實行合作。這樣，那個與希特勒有聯繫的反動集團，即反蘇反人民的波蘭流亡政府，就不能不被波蘭人民所拋棄，排拒了。這樣，在不久以前，才又迫得波蘭流亡政府的現總理米洛拉茲柯，不得不跑到莫斯科，他到達莫斯科後，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舉行談判時，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堅持主張恢復一九二一年的憲法，而波蘭流亡政府則硬要保留一九三五年的憲法，因此，談判沒有結果而回，最近(一九四四、八、三十一、路透電)波總理米洛拉茲柯在招待記者席上宣佈：波政府已以備忘錄送交莫斯科，建議改組波蘭內閣，允許共產黨加入，並轉給波蘇同盟，備忘錄要點是：(一)改組波蘭內閣，使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國家民主黨，基督教勞工黨和波蘭工人黨(即共產黨)，都派同等的代表參加新閣。(二)新閣仿英國制度，設立戰時內閣，參謀總長得以諮詢顧問資格，協助戰時內閣。(三)廢除波蘭軍隊總司令職。(四)新閣由總統任命。(五)一九三五年頒佈的憲法，未經國會修訂前，仍予保留；新內閣應遵照舊憲法的選舉，國會結束後，組織新國民會議，黨派代表的分配與內閣一樣，國民會議等於臨時國會。備忘錄內建議解決波蘇關係的基礎和解決邊界問題的程序，但米洛拉茲柯前在莫斯科既以不肯放棄一九三五年憲法，致談判沒有結果，而此次所提備忘錄第五點，仍要保留一九三五年憲法，是否能夠獲得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同意，當然是問題，按一九二一年憲法，是

本刊啓事

本期代論「紀念「雙十」三十三週年」（潯粹年作）及「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再致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張治中兩先生的信」。
錯遺著「對國人的呼籲」及專論：石衡作「人民是最後的判決者」均奉令免登，謹向讀者致歉。

活躍於敵後戰場的人民兵

八路軍總政治部

抗戰初期，敵人極力作正面進攻，國軍紛紛後撤，（被略）。在敵人的後方，（被略），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敵後漢奸的氣焰高漲，橫行無忌，到處都是敵人的特務活動，廣大人民陷於迷惘的悲觀的境地。我八路軍、××軍深入敵後，擊退了敵人，收復了失地，興奮了敵後廣大人民。掀起了抗日鬥爭的浪潮。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發動羣衆，建立羣衆自己的組織——農會、工會、婦女會等；改善舊的政權的組織，使羣衆參加政權管理；實行減租減息，改善廣大羣衆的生活。在這樣的民主政治和羣衆運動的基礎之上，廣大人民武裝起來了。人民武裝抗日自衛隊迅速普遍地建立起來了，二十歲左右到五十歲左右的男子，拿着手槍、土砲、大刀、梭標都來參加，村中隊部，區隊大隊部，縣隊總隊部，分區設支隊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廣大的人民武裝組織。他們一方面擔任後方勤務，如通訊運輸，作糧草，抬担架等，一方面在敵後方，站崗放哨。搜查行人，鎮壓漢奸一時的漢奸活動，使敵探奸細無法潛入。

武漢失守，敵後戰場成爲中國戰場的主要戰場之後，連綿不斷的「掃蕩」到來了，敵我鬥爭局面急劇地尖銳起來。人民自衛隊也不能不隨着這個新的變化而變化了。堅決勇敢和富於冒險性的青年，自願地組織了青年抗日先鋒隊，或基幹自衛隊，或游擊小組，毅然担負起戰鬥的任務。事實的考驗證明了人民需要自己進行戰鬥，才能保衛村莊，保衛自己的安全。於是這個經過敵後普遍地接受，有的募捐買槍械，有的拆廟換武器，民兵的組織普遍地建立起來了，形成了人民武裝中的骨幹。

共產黨把民兵建設，當作根據地建設的一個重要政策，當作建軍計劃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積極地想出許多具體辦法來扶持民兵發展。

首先黨政軍都認識民兵的重要，愛護民兵，用各種方法提高民兵的政治地位，如民兵傷亡照正規軍一樣待遇，政府經常對民兵表揚，開大會讓民兵坐前排，選民兵當主席團等等，幾乎什麼都有民兵的份，使羣衆都感覺「民兵最吃得開」，樂意加入民兵的隊伍。第二，政府明令宣佈民兵「不升級」，解除羣衆疑懼心理，不允許正規軍吞併民兵。第三，正規軍抽出些槍械發給民兵，又獎勵與幫助民兵自造武器，以解決民兵的武器問題。第四，解決民兵的生活困難，發動愛護民兵運動，比如敵後北八分區會接受離東士紳所提六項具體辦法：（一）民兵在農忙期間進行戰鬥時，土地由人民代耕，保

證莊稼自己的一種好；（二）民兵如調轉農事宜，政府全村民衆幫助；（三）民兵家境貧寒不能生活者，各地士紳盡量借給糧食及種籽，幫助其耕作；（四）如有敵情民兵出外戰鬥時，其家由全村照管，將其財物送往安全地帶埋藏；（五）民兵家屬如不願其子弟參加民兵時，士紳應多方進行解釋；（六）個別份子對民兵有意無意的毀謗與破壞，全體羣衆共同制止。其他地區也採取了一些具體步驟，解決了民兵生活上的一些問題，消除了對家庭的顧慮，使其更專心志於戰鬥。第五，正規軍以「師傅帶徒弟」的辦法幫助民兵，教給作戰的辦法，派幹部去幫助，戰鬥時隨時送給配合戰鬥的民兵。第六，黨的支部將民兵工作當作一個中心工作，經常進行檢查與推動，并派好的黨員參加民兵工作，而在發展民兵時，完全採取自願的原則，注意其政治質量的純潔，政治覺悟的提高，最後，有重要意義的是進行了「民兵英雄」運動。舉行民兵檢閱，讓大衆公選民兵英雄。政府給以物質的與精神的獎勵，這是最好的一種培養幹部，推進工作的辦法，它使羣衆推舉出真正的自己的領袖，這些領袖的實際鬥爭的業績可以作爲所有民兵學習的榜樣，可以把一切落後的領袖帶着趕向前來，并使民兵鬥爭真正在羣衆中生起起來。

兩百萬的人民大軍

由於共產黨建設民兵，開展羣衆性游擊戰爭之政策的正確，敵後的民兵組織至今已組成了兩百萬的大軍。在華北各根據地計有民兵一百五十八萬，晉察冀軍區爲六十三萬，晉冀豫軍區爲三十二萬，冀魯豫軍區爲八萬，山東軍區爲五十萬，晉綏軍區爲五萬，在華中各根據地計有民兵五十五萬，蘇中軍區爲十三萬，淮南軍區爲五萬五千，蘇北軍區爲八萬五千，淮北軍區爲七萬，鄂豫皖軍區爲十五萬，蘇南軍區爲二萬五千，皖中軍區爲二萬五千，浙東軍區爲一萬，總計爲二百一十三萬的大軍（華南尚無統計）。

在敵後根據地裡，最普遍的羣衆武裝組織，是人民武裝自衛隊，幾乎所有青年和壯丁的男女都參加了，婦女還有婦女自衛隊，兒童有兒童團。這些都是不脫離生產，在農忙時間以外，抽出時間進行一些軍事和政治教育，基本任務是站崗放哨，送信及一般的抗戰勤務等，它的數目那是不知要比民兵

通，與與地，甚至與與通，幾百里的幅員，不出地面就可以自由轉移，形成一種地下交通網的形式。并有許多隱蔽的出入口，以保持秘密，有大小不同的掩蔽部，可供居留；有許多曲折部，可與之進行通訊；有許多岔路，以避敵人；有許多通訊口和簡單的防衛設備，以防敵人放毒。在出入口又增設陷阱，出入口的左右上下，又設地雷，使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為平原游擊戰創造出極大的奇蹟。而在太行等山區，民兵組織更嚴密，在山溝裡開闢山連山連地連式的掩蔽部，使之和敵人進行攻守對峙。這些巧奪天工，移山倒海的鉅大工程，無論在那一個區區，都是幾十萬人，成百萬的勞動力量所創造出來的呀！

民兵殺傷敵人，是依靠游擊戰與地形的結合。民兵以高度的分散，三人一隊，五人一夥，滿山遍野，隨時隨地殺傷敵人，使敵人疲於奔命，乘隙而入，啄食其口，假如敵人迫於火，他們就暫時避開，俟其和隊員離散，等其另一個機會再打，大抵叫做「打打打」。這就叫做「打打打」，是快槍快炮的結合。敵人不論上地，都用快槍打，打得快，或逼到一定的死角，地雷就炸了，敵人血肉模糊了。這樣，就使敵人到了我根據地，好似進入了「冷槍地界」，這世界，同時操小吊，步步跟蹤。

我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事方針，是正規軍、地方游擊隊、民兵三種武裝力量的配合行動。有人用「一手拿米，一手拿槍」來形容。其方針是：民兵是筋，民兵是血肉。在作戰上，民兵給正規軍以巨大的幫助，關於地形，我敵後條件的瞭解，是不能不依靠民兵的。有了民兵，正規軍就有了耳目手足，便可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民兵的組織規模大，又使我們能像正規軍一樣的配合作戰，獨當一面。同時，民兵為主力的游擊隊的戰鬥，也出現於各地，如去年五月晉察冀邊區游擊隊的戰鬥，我主力部隊一個游擊隊人軍團之中，而平山、靈壽一帶的民兵，積極活動，四面出擊，終於解救該團突出重圍。

民兵和游擊隊正規軍密切配合起來，就使我們的武裝力量大無比，可以把敵人圍困起來，拔除敵人的據點，擴大我們的根據地。在圍困敵人中，民兵組成圍困敵人的封鎖線，不讓敵人走出據點一步，還不時撲進據點去，襲擾敵人，再配合正規軍打斷敵人的補給線，並進行軍事上的強襲，就可以把敵人擠出去。去年一年中，據極不完全的統計，民兵參加圍困據點戰鬥的，在晉察冀軍區八分區有圍困芝蘭、金口……等據點，在晉冀豫軍區有圍困沁源、關帝……等據點，在魯南有圍困白山……等據點。在魯中有圍困……等據點，在北極區有圍困西南界……等據點，各地都勝利的展開了圍困……人，拔除據點，擠走敵人，擴大根據地的戰鬥任務。

我英勇民兵就是這樣和敵人進行戰鬥的。山東軍區的民兵，去年一年中作戰了八千八百五十二次，擊傷俘敵六千八百〇九名；晉察冀北極區民兵一個分區，去年一年中，民兵作戰三百六十九次，擊傷俘敵三百八十八名，炸死敵前鋒手火佐一名，俘獲敵的太行區，去年一年民兵作戰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五次，擊傷俘敵一千一百三十二名；晉西北民兵，在去年半年中（四月至九月）作戰一千二百〇八次，擊傷俘敵六百六十五名；其他如……冀南、冀南、太岳、華中、華南等地區尚無統計，因而不能作總的統計，但大體估計去年一年我敵後民兵擊傷俘敵不下五萬人。這枝強大的人員武裝正在日益發展中，它的戰績將一天天的驚人。

勝利的保證

在華北之敵，是早已替過民兵的打線，他們稱民兵為「土八路」，「穿衣八路」，「八路外圍」，「八路來源」等。敵人把我敵後游擊隊的游擊戰術打得如此失敗，焦頭爛額，把民兵看作在「掃蕩」，「清鄉」中的「重傷」打擊對象了。

現在華北各根據地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萬，佔根據地人口百分之……華中各根據地的民兵有五十五萬，佔根據地人口百分之……七五，這可以大發展。如果民兵建設工作做得更好些，這支隊伍的數量就更驚人。他們的冀中民兵的發展曾達總人口數百分之八，成為敵後根據地民兵建設的模範。根據這些一些經驗，可以說各根據地現有民兵數目都不够，我們應該儘速支隊任更加雄偉。

有了強大的民兵，就是勝利的保證，不僅已經勝利的堅持了敵後戰爭，而且要勝利的進行反攻。到了反攻時期，民兵就可以較高度的集中使用，如果使百萬民兵，配備以精良的武器，那麼我八路軍，XX軍獨立旅等部，華中敵後戰場，勝利的驅逐敵人將毫不成問題。

百鍊成鋼的晉察冀解放區

孫元範

晉察冀邊區大部的山西北與河北，此外還包括察、冀、豫的南部。它是華北三大主要山區（北嶽、太行、山東）之一，不僅可依靠北線米支持平原，且進東北，而且可以直達地與平綏（同蒲路為界）我軍，南與太行、冀南（滄石與正太兩鐵路為界）我軍，東與平漢與山東我軍，取得配合互相支援。這塊區域共有一百零八縣，二千五百萬人口，包括：偽滿鐵道、偽滿、偽蒙和偽察北政委會。我們抗日政權，在北嶽、冀中、北平、冀南邊區四個獨立行政區域下，設有十六個專署，共轄有二百零八縣（其中有許多縣沒開槍，除阜平一城數年沒開槍外，其餘縣城均為敵佔）。有一千八百三十多萬人民。敵佔於此區的兵力，據今年統計，有偽軍九萬人，偽華北治安軍（及偽北方軍）、偽滿軍、偽蒙軍十萬人，敵偽共計十九萬人。敵偽建立據點已達四千六百餘處，公路二萬七千餘公里，封鎖溝四千四百餘公里，封鎖線四百一十餘公里。但儘管如此，敵人各主要鐵路幹線（平漢、津浦、同蒲之北段、及平綏、北平、平熱、滄石、正太等）和重要據點（北平、天津、石家莊、保定、大同、高台、承德等），七年來仍無日不處於我嚴重威脅下。現在晉察冀和華北其他各區一樣，已經渡過了四一、四二年敵國難於進軍的階段，而進入日漸恢復與擴大的新時期。北線我軍已挺進至察哈爾的多倫、熱河的寧城、遼寧的錦州一帶。

晉察冀邊區之能維持發展，日趨鞏固和擴大，是以巨大的代價換來的，他的代價是無法統計的勞力、苦難、犧牲和血。現在讓我們來重溫一下這艱苦的歲月吧。

建立的開端

八路軍於七七事變後開槍時，毛澤東同志給予如下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方針是：在敵後牽制敵人，建立根據地，進取正面才識之持。因此就準備派一部兵力進駐燕山山脈，深入敵後。但剛一出動，南口就失守了。隨後接到軍委會的命令，前往蔚縣阻敵，途中蔚縣又丟了。二戰區又命進駐獨孤口（與蔚縣蔚縣之間）阻敵，但師至太原，飛狐口又丟了。這時，敵人已全副武裝，進山西北部的國防工事，正擬突破平型關、雁門關。於是二一五師就趕到敵後，阻止南下敵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關打了第一個大勝仗。於十月，太原、忻口形勢吃緊時，八路軍急往馳援，總部率我軍主力，星夜離開五台南

下。這一師的副師長張敬奎的孫榮華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區，創立第一個堅持之後游擊戰的根據地，所有的兵力是一連獨立團，一營騎兵營和不完整的兩個連，共一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孫榮華同志為首，率朱彭副團長之命成立了晉察冀邊區司令部。

晉察冀三省邊陲地帶，當時處在極端混亂狀態中。日偽的禾黍無人收割，平漢綏上無數的難民逃至山村小鎮，大車拉着鐵道公路兩旁飛跑，大砲、機關、步槍對空齊射，（敵略），土匪竄起，幾個日本浪人拿着日本旗，可以隨時佔領縣城。然而這樣的局面並沒有繼續多久。那兩千人的隊伍在風一浪向前推進，獨立團很快成了威震北平南一帶的楊震隊，騎兵營打開了冀南的游擊區，政工部編成的工作團，帶着一連兵力，到打響敵人。徒手的黨委在任帶去打掃敵，被掃蕩的槍聲重新找到了他到最過當的主人。人民的情緒在逐漸好轉着。但嚴重的問題是老百姓並沒有從這「壓迫下解放出來，如早平日的窮人還沒有吃樹葉的權利（樹是地主的），於是地主與窮人的關係，邊區每一村村落都起了動員熱潮，游擊隊、義勇軍、自衛軍等紛紛動員長起。動委會又會同進行了政治的任務，認真地實行救濟措施，俾得抗戰，停徵田賦，廢除了苛捐雜稅，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實行合理負擔。但這些只是邊區的初步，組織起來的武裝要打仗，要吃飯（十二月津浦鐵路被擊，今區有一萬二千多武裝），三萬的人「五百有餘，平漢路有兩萬餘的武裝要打成一片，大家進進退退一切有統一的辦法。這時日偽對東北政治主任宋劭文和孟憲承兩人在堅持抗戰工作，他三時常和孫司令見面，都贊成建立統一戰線的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被略），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開幕於阜平縣，這一行政委員會的組織和人選，隨即得到蔣委員長和行政院批准，抗日的新秩序不用月就普「建立起來了。

冀南方面，大軍南撤之時，孫元範同志帶領兩個營向敵後方挺進，擴大了深澤、安陽、任邱、開關、歐陽、安陽、高陽等地的游擊區，三八年四月一日成立「冀南政治主任公署（後改行署），由孫元範平原從此便開始起來。三八年五月二〇師的主力會進入冀中，進行了有名的河間城戰，包圍了平原的游擊戰的膠河，（一二〇師主力，後經過北嶽區參加了陳莊、黃土嶺等戰役，於四月間轉回晉西北）。同年六月，朱彭率隊挺進平北冀東

，七月九日在李運昌等同志領導下，爆發了冀中七縣的抗日大暴動，在十七個縣展開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十月以後受到一些挫折。三九年春冀南同志到平原組織挺進軍，繼續開展平北冀東的游擊戰，冀東人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游擊運動，豐玉一隊蘇集子彈十九萬發，蘇集捐槍二百餘枝，婦女和兒童幾乎每人捐槍一件彈物。冀南的冀熱遼察的抗日根據地從此建立起來。

勝利的起點

三八年春，敵人一個個聯隊來打涿源，我們新建立的部隊就轉到紫荆關到林交迎線的兩翼，不斷襲擊敵人的運輸給養，將涿源孤立起來，於是敵人駐紮了一個團，便滿地撤走了。為了配合涿源、晉南正面的戰役，二月的一個團，我們在平漢與津浦線上展開大破襲戰，攻克望都、新樂、定縣、青風店等城鎮，好幾縣的城鎮都參加了破路和搬運軍用品。這是平型關以後的大勝利。為了進行「破襲」，敵人調集一萬二千以上的兵力，四路向軍區進攻，曲陽一帶有五千多人，以飛機十多架掩護，配合千餘騎兵，用猛烈砲火，向阜平撲來。一個黃昏，敵人從正面逼進阜平的東郊。城內各機關和老百姓都按照指定的方向徐徐撤退，天快黑了，通訊員向最後離城的老鄉說：「我們暫時離開這兒了。現在這是一處空城，我們不能讓敵人得到半點東西」。敵人在野外停留了一夜，大砲向空城轟擊到天明，第二天上午才進佔阜平，但他們不敢繼續深入，因為後路被切斷了，其他各路配合的形勢也已經完全被打破了，當天夜間敵人就慌忙退出了這座空城，分三路跑步逃奔二百多里，我們的追擊部隊，從兩側夾攻，猛追到曲陽地界，敵人只得爬上汽車再次逃跑。

游擊戰猛烈的展開着。游擊隊一直出現於北平的四郊，敵人嚇得把城門都關了起來。敵報漢奸的報紙於是戰慄地叫喊：「日軍大舉圍攻武漢之際，華北獨據於神北、察南、冀東等地……之共產軍，總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峯之五台山附近，各地皆屬支黨。近益擾亂內長城線，威脅北京。……日軍決心一面圍攻武漢，一面掃剿五台」。

敵人改變了戰術，新的圍攻與反圍攻的戰役開始了。九月二十日，八路軍人，五萬兵力，向五台區域圍攻。我們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對抗敵人的圍攻，使敵人找不到我固定陣地與固定戰線，而常於撲空之餘，遭我痛擊。於是從五台出沒深入五台的敵人被我打退了，陣亡了一個連水少將，敵人還搶掠「凱旋」五台城。不久，我們就進行了戰役的全面反攻，敵人共損失三千多人。關於這次戰役，當時英政府會來電問我外交部，外長王寵惠答稱：「我軍仍在華北敵後堅持，五台山根據地依然屹立。」

「變落後村莊為進步村莊」

敵人第一次圍攻涿源，我們是勝利了，但同時也暴露出我們的許多弱點：一年來我們的正作還不十分深入，許多區村政權仍為少數人把持，保留着一些落後份子。公正人士都還不願出來負責。在敵人的圍攻中，大落份的村政權都塌台了。因此我們就提出「把山溝小道落後的村莊變為進步的村莊」的口號，號召各村組織救亡室或民革室，以發動民主，協助村政，同時着手改革村政權：將區劃小，取消區村，取消區長包辦的區團制，建立村代表會與村公所各委員會，熱烈地開展村選運動。在反圍攻以前，由於多年受壓迫，老百姓對民主參政是沒有興趣的。區村政權改革後，老百姓懂得了：「還是民主好，大家的家大家管」。他們選好人當村長，替他們辦事。三八年村選中，選民僅佔公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四〇年大選中，選民與公民之比平均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心地區之縣（如平山、靈壽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游擊區的選舉，成為團結一切抗日人民的羣衆運動。抗日民主政府的機構，由去年一月的邊區參議會最後完成。政府人員精簡百分之五十，工作效率因而提高。「統一累進稅」的實施，是以組織中一個最大的成就，所有邊區的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一種極公平合理而管理得很好的稅制。村政的幹部一律不脫生產，七年來無休息地艱苦工作。例如某莊村聯席會主席女幹部郭秀金，她那村子處於敵人三面包圍，糧食只靠牛馬路，歷年反「掃蕩」反圍攻都是她帶領羣衆轉移，組織抗敵組織。去年敵人突然佔領了這個村莊，到了黑夜里，天下着大雨，她帶領着民兵衝過去，槍出了幾萬斤公糧，第二天又獨自爬回村內帶出文件。但是七年來，他們犧牲被捕的數目也是非常之大的，手頭只有前五年（四二年至四五年）的一個材料：據已知的有三千七八百個以上的幹部光榮的犧牲或被捕了。村政幹部更不止此數。犧牲的幹部中，無一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好兒女。徐水縣長劉澤同志，當他被敵包圍後，用槍打死了幾個敵人，最後他與自殺，槍彈已盡，因而被捕。敵寇漢奸先則利誘，繼則加以無法形容的酷刑，劉縣長却不會有一個字的口供，他憤怒地宣佈了敵寇的罪狀，他絕食十天，光榮殉國。

大水災的考驗

冀南臨門等相結合的民主運動，提高羣衆覺悟性與組織性。因此我們獲得第一次大考驗——三九年夏的大水災。

三九年七月，晉南為災，河川泛濫，敵人在冀中決破了四處河堤，萬里洪波，造成了數十年來邊區未有的大災。被毀良田不下十七萬頃，被沖糧食不下六十萬石，淹沒的村莊一萬多（其中佔六七五二村），人畜的傷亡也萬

嚴重。災民三百萬，到處聞哭聲！可是我們有一切力量克服水災給予我們的困難。四〇年春，政府貸款三百萬元，賑濟一百餘萬元，種子借貸四七六七石（北嶽二十縣），耕畜補充牛六九二一頭（十四個縣）……所有勞動力都參加了修繕組織。根據北嶽區不完整的統計，水災前二十一縣原有灘地一七〇、四二七畝，沖毀了一四七、六二六畝，修復一三九、四九五畝。邊區子弟兵全體動員，日夜幫助人民修繕，挖大渠，挖石壩，他們還每天節省些小米給老弱們吃。總計他們幫助修繕一〇〇、〇〇〇畝，幫助春耕一八一、二七八畝，開渠一五〇道（可澆地十萬畝），掘井一六〇眼。難怪阜平的老鄉一看到沙河沿岸的麥秀稻秧，便念念不忘的說道：『多虧救災團，不然三十年也修不起來』。冀中區敵寇決口一百八十五處，因而救災中就是治水，總計四〇年全冀中軍民共修堤工五九處，築堤三三條（長五二八里），堵決口一九七處，清河九道（長一六五里），這些都是民團以來少有的大水利工程。因此冀中不但克服了三九年水災的災害，並且得到四〇年的豐收。

（被略三百字）

百團大戰之後

三八年敵人八路圍攻失敗後，三九年敵寇採取單刀直入，以相當優勢兵力，一路深入襲擊我中心地區，（如靈壽之陳莊及涞源之黃土嶺等役），結果爲我造成大好滅敵的機會。敵寇進攻陳莊的一個大隊全部被消滅了。黃土嶺之役，第一天敵人的一个大隊遭我伏擊，第二天旅團長阿部中將又親自帶一個隊出動「報復」，打了兩天一夜，阿部隨其部下葬身於黃土嶺荒涼的山丘。敵人哭喪着脸說：『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經過這些打擊之後，敵寇不敢孤軍深入了。四〇年起，敵人大量印發我們出的一批書籍，對我游擊戰及十年國內戰爭作全面研究。敵一一〇師團長桑本讓明建議普遍採用「網際政策」，實行所謂「網際分散配備」，以亂控制平原各大村鎮山地各要點，想空死我軍。百團大戰的時候，敵人的海點被拔掉了，鐵路被猛烈破壞了，敵中的自衛隊一夜之間汽車路全部破壞。正太鐵路剩了兩萬多民兵，編成五十個大隊。

冀東會動員八萬多民衆，把敵人在七八個縣內的公路電報，破壞得乾乾淨淨，在封鎖進化縣二十五天中，城內敵人因燃料缺乏，把門窗都折毀壞了，最後並托偽組織人員，騙出數十餘萬元，要求我們解除封鎖。

百團大戰之役，使敵人狼狽不堪，認識了我之力量所在。於是重新加修

堡壘工事（用山砲試驗是否能打入），改變設備，徹底實行三光政策，企圖毀滅我人力、物力、財力。從此我根據地進入了最殘酷最嚴重的堅持鬥爭的階段。

一九四一年八月，敵自涞源村經過長朔準備，對北嶽實施所謂「鐵壁包圍」戰術（縱深配備，各路挺進，層層緊縮圍困，圍城滅我主力）。七萬大軍直撲邊區，山溝小道無所不至，施用了最殘酷的三光政策。「掃蕩」兩月，我根據地受很大損失（被燒房屋十五萬餘間，損失糧食五千八百萬斤，牲畜二萬餘頭，被擄殺人民四千五百餘人，被擄去東北作苦工同胞一萬七千餘，犧牲與被捕幹部六百多人……），但敵村不能不自認失敗，說『肅清八路軍非短時間所能奏效』。這以後，又製成『高度之分散配備』，到處築立堡壘，挖溝打牆，堡壘之密，幾至各村都有（據點周圍與鐵路公路兩旁，有多重七層的封鎖溝與牆，主要的道溝，寬深各二丈，有的且引河水灌入），對根據地實行糧食政策，初則步步推進，計不得停，又以大軍舉行局部「掃蕩」以達其大塊糧食的目的（四二年對冀中的「掃蕩」即屬此種性質）。同時又進行『體力戰』的『治強運動』，製造『無人區』，集注全力於人力物力的掠奪毀滅，與進行可笑的『思想戰』。四二年一年中，全邊區軍是我無窮同胞之被擄殺、毒打、被捕、森淫者，爲數當在十萬人以上。我軍民一方面展開反糧食反『掃蕩』的尖銳鬥爭，雖一村一鎮，一個山頭，一道溪流，一畝地，一斗糧，敵寇想取得，都要付米大代價。（四二年五月，敵寇「掃蕩」冀中，爲爭奪藁城縣一個北候村，敵人死傷七百餘人）。同時提出『到敵後之敵後去』的方針，敵人要求來歸縮我，我們就將圈子擴大，敵人的頭伸向根據地，尾巴便被斬斷。

民兵如何作戰

沒有民兵廣泛的游擊戰與配合主力作戰，所謂反『掃蕩』反糧食的鬥爭便無法取得勝利。起先有許多落後的觀念是不承認民兵的，說民兵『老弱』，後來這些人自己得到了民兵的好處，才轉變過來。自從民兵與生產結合以後，發展就更快了。現在全邊區的民兵已有六十三萬。戰鬥、打敵人，這是民兵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在過年時，劫餘的山村還是響着槍天的到處有人拾拾豬、羊、柿子、核桃去慰勞抗屬和子弟兵。各地的敵偽軍車正在忙著怎樣來偷過年的食品，於是免不了有一場戰鬥。敵人想進村口了，村子裡的人

（這是不相稱的），發明了許多開所未聞的毒刑。然而冀中人民對所遭受的殘酷，已認爲是強暴敵人的必然發生的事情——從沒有人去討論它。經過五六年鬥爭，無論男女老少，都明白一個真理：「你不殺敵人，敵人就要殺你，凡敵人所知道的任何事情，一定是對敵人不利的事情」。去年春天敵人包圍安平一村時，密打被圍的老百姓，要他們指出抗日幹部。結果沒有一個人響應。敵人說出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當衆嚴刑拷打，他的母親便在旁邊大哭。叫他「不准說」，敵人將他抓往另外一個地方，這位母親還邊哭邊喊：「孩子可別說呀，咱娘倆就死在一塊，也不能留姓名」，這句十二歲的孩子死去活來五次，終於說出一個字。敵人無可奈何，最後指著大家說：「要麼死，你們都是八路軍。」

環境越困難，鬥爭越殘酷，繁榮越感到需要抗日政權來保護他們。冀中抗日政權，由村到鄉，在冀中前線都是公開的，甚至某些敵偽漢奸也明知抗日政權的存在，而無可如何。事實證明，當繁榮真正結成一條心時，任何殘酷殘暴的敵人也是沒有辦法的。

去年秋天的大勝利

去年秋季敵對冀中北線進行了歷時最久空前規模的「掃蕩」，反「掃蕩」戰從九月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整整三個月才結束。敵偽動員兵力達四萬多，企圖用殘酷的屠殺手段，從經濟上毀滅我全區人民的生存條件；破壞我秋收，秋耕與徵收，洗劫我糧食、資財，毀滅我人力物力。我們採取了各種鬥爭的密切結合。特別是主力與民兵的結合，內線與外線的結合，反「掃蕩」與以攻勢的結合，軍事鬥爭與其他鬥爭的結合，這四種結合，保證了對敵強而有力的「總力戰」，保證了我們的勝利。

九月底種仙山的戰鬥，我守備隊四營抵禦了敵偽軍四千多，苦戰十二日，終於打退了敵人圍攻。其中金龍河戰鬥，敵人一千五百多，我們只是一個連，持續了八天，結果殺傷敵人一百八十三名，被地雷炸死的五十六名，我們付出代價，僅傷七人傷亡（連裡面還有三人是弄壞的）。我們又創立了以神槍手組成的飛行射擊組，他們配合主力狙擊敵人，以極少數或幾乎沒有犧牲獲得最大代價。民兵們地雷戰收效很大，前一個半月內，敵人因地雷傷亡的佔其總數十分之一強。三個月時間內，湧現了無數的英雄和模範，河南區隊的政治主任楊世明，三個月內毀了同蒲路機車的百分之二十五，他發明瞭許多破壞鐵路的辦法，現正爲各地部隊效法着。敵人李殿冰一

個人殺傷了十七個敵人，他的故事也被編成劇本，在邊區到處演出。今年一月的某次大會共一百零四個敵門英雄和模範。

這次「掃蕩」中，足以表現各種複雜鬥爭相結合的，是秋收、秋耕、徵收和救災工作的完成。我們一方面要秋收，秋耕，一方面要和敵人爭奪已被搶去的糧食；主力、民兵要積極和敵人打仗，要擔任救災；有時還要親自動手救災，我們要把敵人各種活動的規律，要爭取一切空曠。所有專署、縣、區、村各級幹部，都分區、分組、分村配備下去。組織軍事武裝隊。除子弟兵的配合行動外，白天由基幹隊及游擊小隊與敵周旋作戰，掩護救災，並由編組自行約定時間開工。救災工作，規定幹部負責。到十月中旬，大部秋收完畢。被敵人搶去之糧，則由軍隊收回。王快據點，一夜之間圍攻十二次，連續三天，把二百多敵子槍收完畢，又把敵人搶去的十二捆糧食也搶回。完縣附近河沿許多村子，只剩兩三個地方，就會動員了五百多民兵，七天中槍收了一千三百餘。各地秋收秋耕，在許多地區比過去的一年還好。儘管敵人如何瘋狂的洗劫破壞（殺我同胞六千多，燒房屋五萬四千多間，毀糧食二千九百多萬斤，掠走耕畜一萬九千多頭……），我們的社會秩序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反「掃蕩」戰中，各縣公糧已大部完成。任何部隊或機關團體到各縣徵糧，糧食供應從未出現問題，軍民的冬衣都普遍得到解決，對於抗日救國在每個反「掃蕩」戰中，照常出版。

今年初，我們發動了空前的大生產運動。爲了生息民力，堅持抗戰，邊區今年并發動公糧×萬大石（其中，平北等區適當超額）。去年秋收所獲受的割割，不久就會復原過來了。

生產帶來了新氣象

今年由於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給我們各方面帶來了新的氣象。幹部的思想轉變了，人民的認識提高了。特別是提倡農工互助，牲口貸款實際幫助解決了缺乏勞力畜力的困難之後，羣衆的生產與戰鬥情緒就更加提高了。許多村子建立了個人早起的鐘和鼓。村與村，組與組，甚至父子都有競賽。農工組織，能動佔全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六，至平有三分之二男人在農

工組織，唐縣佔全人口百分之十九。勞動效率有的竟提高一倍，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按戶計劃各地都進行了。農工在游擊區也相當普遍開展起來，有的村子的土地互相開墾成兩片，於是滿外的村與滿地的地地變工，更增加了兩村團結。許多過去逃荒的災民也都紛紛回來。數不清的游擊隊與農工相結合，白天耕地，夜晚練習埋地雷，爲了使第一線（最靠近敵據點的）的村莊安心工作，各地都在發動村聯防制，普遍設崗哨，村幹部輪流檢查，一發現敵情，就互相接應。許多距離敵堡最近的村莊，由於農工組織和戰鬥任務組織得好，都能晝夜槍耕種了。現在幹部到村裡，羣衆都爭着讓他們到自家裡吃飯，自動把生產計劃對幹部審查，羣衆都自願突擊抗匪的生產地。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幹部不參加農戶勞動。

阜平上莊的人民，更是建立了健全的生活制度。據三月間的統計，全村一百四十五個男勞動力，參加了農工組的已有一百人，分爲二十一組，一百一十八個男女勞動力中，已有五十人組織起來分爲十一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另外有一個人專負責政治和文化的學習，政治沒有課本，多是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或是複習學校的課程。文化課主要是識字，拿着什麼發具學什麼字，幹什麼活兒學什麼。農工組與游擊隊組織一起來，平時分散游擊，以自然村爲單位，組成一個農工組，戰時以行政村爲單位，過集體生活，實行集體農工，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他們每天完工時檢討一番，七天開一次總的檢討會，每小組都有自己的包括生產戰鬥和學習的紀律或公約。在緊張的生產運動中，民校仍舊堅持着，而且人數很齊全，學習情緒很高，男人晚飯後上課，青年婦女早上上課，逢餐，早飯後上課。童子軍每天把街頭打掃得乾乾淨淨。婦女紅工組還訂了衛生公約：「早飯後，一定要掃地，刷傢伙。戰時要保護雞、豬和牲口，並看護傷病人。」

這只是給游擊隊戰鬥、生產與教育相結合的農村，描畫了一個輪廓。這新的農村生活，目前一方面最普及，一方面是內容的日見豐富。

七年來極不完全的統計，我邊區子弟兵（民兵在外）與敵戰鬥二萬零五百餘次，粉碎敵人千人以上，十萬人以下的大小「掃蕩」，一百一十二次，其中戰時最久最殘酷的「掃蕩」共有四次：一爲四一年八月，敵以十萬兵力對北撤持續兩個多月的「鐵壁合圍」；「掃蕩」；一爲四二年敵四萬兵力對

冀東三個多月的「掃蕩」；一爲同年五月，敵五萬餘兵力對冀中的「掃蕩」；一爲去年九月，敵四萬兵力對北撤持續三個月「掃蕩」，總共斃傷敵兵十八萬餘人，擄長短槍五萬八千餘支，各種砲百餘門，各種機關槍八百五十餘挺。我軍亦傷亡指戰員八萬餘名。

今年以來，敵人對游擊區更趨多（兵力不足，分散配備，紀律廢弛，士氣下降，與偽軍矛盾），邊區各地，特別是北撤與冀中，敵偽據點與據點大量被攻克與逼退了（一二月份，兩區共獲四百五十五座）。許多敵佔領縣城，因爲懼怕我軍攻襲，多把城門關閉，敵偽軍不敢出城一步，偽軍更如野兔，一碰即碎。我們恢復了許多地區，新開闢了許多地區，許多游擊區已變爲根據地（如冀東），冀中不但恢復了四二年「掃蕩」前的局面，而且更發展了。敵人對我根據地是不會一日放鬆的，今後敵人必然將搞出更多的新花樣，搞出更殘酷的罪行。然而，敵人最根本的弱點是沒有人民，它是立於不穩。去年「掃蕩」北撤三個月，就沒有有一個人以爲搞維持會。我們有人民，我們軍民團結如一個人，這就是我們致勝的根本之道。當然，儲蓄接近光明，鬥爭越殘酷，這一點，敵後軍民是很明白的，我們還有許多困難待克服，冀中許多戰士就刺刀手榴彈和敵人拚（然而，他們還時常收入關城），由於敵人的毀滅性進攻，許多地方軍民仍感衣食不足，甚至有的連過着牛火居半露宿的生活。因爲從來就是伴隨着困難而生活的，一個外來的人看了亦許會驚異得目瞪口呆：「你們怎樣打仗的？」但那些百鍊成鋼的軍民却是習以爲常了。然而，不管怎樣，對這樣的局面，一個有正義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居住邊區很久的國際友人林邁可先生，就表示了他的意見：「習察軍隊的動能及人民的組織既然已發展到目前的程度，那麼限制着游擊戰努力的因素是糧食和軍火。其中軍火是基本的問題，因爲只有有了適當數目的輕武器及彈藥供給，才能使日寇出動動槍紛紛得不償失。才能使中國方面收復並完全控制除了日寇九個最大的據點以外的平原富饒區域。如果除此以外，軍隊還能有機動靈敏的新式輕便及大砲少數空軍的援助，那麼敵人就可以被打退到鐵路線上，並使他們不能利用華北的資源。甚至日寇沿鐵路線的交通，倘使他們不大大增加其兵力，也是很難保持住的。今天同盟國還未輸入勝軍以他們需要的比較少量的軍需供給，是同盟國對日作戰努力中物資分配的失策」。

這樣的意見正說出了今天邊區軍民的希望和請求。

三十三年七月

戰鬥中成長的晉綏解放區

在七年抗戰的烽火中，晉綏邊區三百餘萬人民，經過了千難百鍊，變成了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它們勝利的果實，就是創造了屹立在西北河防前線的晉綏抗日根據地。

這塊地方，東至同州、平綏鐵路，西至包頭，北面是綏遠大青山和內蒙古草原，南面依托汾離公路，面積三十三萬餘平方公里。全境包括了山西的西北部和綏遠的大部，橫跨晉綏兩省，控制了太原，綏綏兩個省城。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共轄三十六縣，六個專區，二專區有神池、朔縣、偏關、岢嵐、五寨、保德、河曲。三專區有臨縣、隰南、離石、方山。八專區有陽曲、交城、文水、清徐、太原、祁北、榆太、靜樂、離東。六專區有靜軍、武寧、忻縣、神縣。五專區有右玉、右南、左雲、平魯、山胡、懷仁、大同。直隸區有興縣、嵐縣及神府代管縣。大青山抗日根據地轄九個縣五個專區。其中有歸綏、包頭、武川、陶林、涼城、集寧、豐鎮等。

晉綏抗日根據地是華北各抗日地區的樞紐，是前後方的交通要道，是華北五大戰略要地之一。它除西面與陝甘寧邊區隔河相連外，其他方面都隔敵人的封鎖線，三斷受敵包圍。在敵人瘋狂進攻下，七年來我軍經常抗擊敵寇二萬一千餘人，抗擊偽軍三萬七千餘人，打垮敵寇七千餘人的進攻和「掃蕩」，至今掌握在我們手裡的縣城尚有河曲、保德、偏關、岢嵐、臨縣、興縣等六個縣城。特別是這兩年，我軍力量日益生長，根據地日漸擴大與鞏固。在這抗戰進入第八年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七年來晉綏邊區民所走的艱苦路程。

拖住了敵寇的牛尾巴

抗戰爆發不到三個月，敵寇就突破了長城線，晉北守軍和官吏繼擁南退，敵騎長驅直入，情況萬分緊急。八路軍一二〇師在賀師長關公毅領導下，繼而晉西北堅持了陣地，拖住了敵人的牛尾巴，在神池、寧武、朔縣一帶阻敵，配合正面友軍防守行口。十月十八日一二〇師曾在雁門關以南伏擊敵人汽車五百餘輛，佔領雁門關，佔領崞縣附近南北大常、王董堡，切斷了敵人的後方交通，使敵軍用飛機運送彈藥給養，敵人吃不到大米，白麵，只好用草子充飢，給防守折口的友軍以很大的幫助。太原失守後，我軍堅持在太原附近展開游擊戰爭，這時敵的一二〇師不但每天要和我軍作戰，而且還幫助友軍收斂散兵，設法將人槍送回原部，連友軍軍長傅作義等也因我軍的

奮勇配合，而安全撤退至後方。

當時戰地動員委員會及續盟會在晉西北各地積極動員羣衆，參加抗戰，民衆也因為一二〇師，新軍的英勇作戰，自動大批參軍。一九三八年二月各軍奉命反攻太原時，一二〇師擔任截斷同蒲路北段交通的任務，在十九天的激戰中佔領平社、高村、原平等車站，破壞鐵路五六十里，橋樑十九座，使敵人一個多月不能通車。三月大同敵後官衙剛以萬餘兵力，進佔寧武，神池、五寨、岢嵐、偏關、河曲、保德等七縣，那時一二〇師主力正在同蒲路上作戰，聞訊星夜趕回，兩天強行軍走了三百餘里，經過二十多天的血戰，把敵人打退，收復寧武等七個縣城，使晉西北局勢轉危為安。五六月間，三十五軍反攻綏遠，一二〇師派兵配合作戰，後三十五軍收退，當敵人大舉吹牛，說「中國軍隊不能再前進」，「誰到綏遠就消滅誰」，而我一二〇師就在九月間派了李友隊配合動委會深入大青山地區，創造了綏中、綏西、綏南以及察哈爾的游擊戰爭，一直堅持到現在。

民國二十七年秋，武漢失守，因為華北游擊戰爭的開展，給敵威脅很大，敵乃調師北實行「掃蕩」。一二〇師奉朱彭總司令命令，主力東進，歸兩區正副總指揮之三縱隊，保衛冀中平原，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來回進退了十幾道敵人封鎖線，與晉察冀部隊配合，粉碎了敵人五次大「掃蕩」，進行了二百多次的戰鬥，其中較大的如齊會三天三夜的戰鬥，消滅了敵人千餘，實土嶺三天兩夜的戰鬥，打死敵阿部中將。

一二〇師留在晉西北的三五八旅、警六團、雁北支隊，則協同友軍保衛晉西北，二十八年三月，粉碎了敵寇「掃蕩」，收復嵐縣。其中較大戰鬥，有交城邢家莊，嵐縣明家莊等戰鬥。

新政權的獨立

(被略一段)

在這種情況下，晉西北抗日人民、軍隊、黨派及羣衆團體，爲了保衛晉西北，繼續堅持抗日，乃共同建立新政權，公推國民黨元老新軍領袖賀龍爲行署主任。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召開了第一次行政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製定並頒佈了晉西北六大施政綱領，並佈置了以後工作，其中心爲：①促進憲政運動，徹底改造加強各級政治機構，實施民主政治，區村長民選，給抗日人民以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籌備參議會，建立各級行政會議。②擴大抗日革命武裝，加強自衛軍，開展羣衆運動。③確定救濟災民難民，果進合理負擔，減輕賦稅，優待抗屬，屯集公糧等辦法。

敵寇爲破壞晉西北新政權的建立，四〇年初實行了空前未有過的春夏冬三大大「掃蕩」。在春季「掃蕩」中，敵出動五千餘，佔領了友山、臨縣、瀋縣，我軍經過卅八天的戰鬥，才把敵人打退。收復了這三個縣。六月七日，敵二萬餘進行夏季大「掃蕩」，我軍經過四十五天的苦戰，進行了大小二百五十一次的戰鬥，才將敵人「掃蕩」粉碎，其中最大的戰鬥有芹里鎮戰鬥，米峪鎮戰鬥。八月間百團大戰開始，晉西北的一二〇師、新軍及地方武裝都參加了這個戰役，經過五十天，我軍直打到太原、汾陽、忻州、韓縣、朔縣、大同附近。共進行了三百餘次戰鬥，斃傷敵軍六千餘人，俘敵軍四百七名，俘馬車三百五十名，繳獲長短槍八百八十五支，砲六門，擄俘敵十四

個，破壞鐵路一百七十五里，公路九百四十里，橋樑七十四座，給敵以沉重打擊。敵爲報復，緊接着就發動了兩萬多人的冬季「掃蕩」，對晉西北進行了殘酷的「三光政策」，經過三十五天二百多次戰鬥，終又將敵人「掃蕩」粉碎。這就是一九四〇年一年中一二〇師進行的四個大戰役。

二十九年整年中部隊都在行軍作戰，黨、政、民衆團體和全體人民也都圍繞着堅持對敵作戰而努力。政權工作，基本上是迎接戰爭，克服混亂，積極發實徹了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召開各地士紳座談會，傾聽人民意見。村政權進行了初步改選，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並組織了軍政民慰問團，慰問了戰爭中受害的同胞。

這時期，反「掃蕩」戰爭勝利了，根據地擴大了，根據地軍民經過了嚴重的考驗，爲各級政權建設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村政權改選

二十九年九月，行署召開了第二次行政會議，議定三個工作中心，就是：健全村政權，開展生產建設，加強教育工作。三十年九月第三次行政會議，使晉西北的政權工作更進一步的正规化。會議根據當時政權工作的基礎，晉西北軍民的需要，確定財經建設爲當時政權工作的突擊方向。同時對於政權建設，對敵鬥爭及政權建設如貫徹村選，籌備參議會等作出了重要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晉西北是徹底實行了，並受到了各階層的熱烈擁護，如民國三十年村選當中，十一個縣五十五個行政村的統計，主任代表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是中農，百分之三十八是貧農，佃農和農村工人，百分之十六是地主富農；村長中百分之三十二是中農，百分之五十三是貧農，百分之十四是地主富農。晉西北行署也確定公糧徵收制，劃一稅收，規定除烟酒牌照稅，營業稅，捲烟印花稅，出入口及過境稅四項外，將過去舊社會的苛捐雜稅一概取消。

在民主設施與人民生活改善後，人民抗戰的積極性更進一步的提高了，一九四一年敵寇對晉西北進行了十七次局部「掃蕩」，全區軍民不但粉碎了敵寇「掃蕩」，並主動回擊，打了一千多次仗。各地的游擊小組，有抗先，民兵都紛紛發展起來了，在每次的反「掃蕩」的戰鬥中，都能配合正規軍擊

敵，民兵的數目，一九四一年中就達了三萬人，對敵戰鬥六七十次。他們用的武器有步槍，手槍，手榴彈，火槍，而舊式武器如地雷，槍木礮，獨角牛等也發揮了不小的威力。每次掃蕩時，行署規定各級政府在戰爭中，必須領導人民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各級政府不得離開所管轄的地區，實行不離鄉，區不離區，村不離村的原則。

敵寇瘋狂的「圍食政策」

一九四二年是敵人「掃蕩」「圍食」晉西北最殘酷的時期。一九四二年二月敵又以一萬兵力，進行春季「掃蕩」，採取所謂「鐵壁合圍」，「梳篦隊形」等戰術。我二〇師、新軍、地方游擊隊以靈活的戰術，經過八十四天大小二百餘次的戰鬥，把敵人「掃蕩」粉碎了。四二年五月十四日敵十六旅團五十九大隊村川大隊，竄入興縣縣城，我軍從大蛇頭打起，一直打到白家塢，用家會。敵村川大隊，被尾中隊長被擊斃，多田中隊長受傷。敵軍一千四百餘人，除三四十人逃脫外，其餘全部被殲滅。

敵寇對晉西北的四大「掃蕩」及無窮次小「掃蕩」被我們粉碎了，便積極採取圍食政策，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漢奸所動，第二個階段是獨立據點，第三個階段是掃蕩建立後，加強壓迫，加強掠奪，以殘酷的「三光政策」與陰謀欺騙，實行所謂「強化治安」。

敵人用這一套殘酷的、笨拙的、嚴密的、由秘密到公開，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佔領區而游擊區而內地區逐步圍食的政策，曾收到了一些效果。四二年敵人打通了嵐縣公路、靜寧公路，按設了蒲閣峯、芝蘭、金口等數十據點，分割與縮小我根據地，並以嵐縣、東村、符明、婁子等據點為中心，向我內地區「圍食」推進。

同時敵人也進行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設立「和平團」，「新民工作先鋒隊」等，進行特務活動。四二年十一月敵更將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改為「新國民運動」。加上，由於過去我們對敵力量與陰謀估計不足，對敵佔區，游擊區人民的負擔，以及惡劣性的游擊戰爭開展還不够好等等原因，使我在敵佔區游擊區的工作及「圍食」工作上遭到一些損失。

「把敵人擠出去！」

為了加緊反對敵人的進攻與「圍食」，執行毛主席「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在四二年底晉西北行署規定了以對敵鬥爭、經濟建設、精兵簡政、肅清三風為一九四三年的四大工作，並實行領導一元化，使主力精幹、民兵發展的方向。四二年五月，反圍食鬥爭即開始了，並已有初步成績，特別是在六分區、三分區，我軍給敵人「圍食政策」打擊很大。除八專區未統計在內外，半年來共摧毀偽村政權維持會三六八所，僅四專區經過等敵自首或停止維持的即有二百餘人，在游擊區敵佔區的游擊活動也大加開展。

我們對敵鬥爭的方法：一個是加強武裝工作隊，把過去熱烈的對敵鬥爭工作及敵佔區工作，統一起來，使我們的對敵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鬥爭，成為一個統一體，深入敵佔區活動。對敵「圍食」則進行了精確的調查研究工作，從發展中了解敵人的各種手段和方法，具體分析了敵偽「維持會」的產生及參加「維持會」的人物、關係及其過去和現在的態度，決定予以打擊或爭取。使用這種科學的結果，我軍給敵「圍食政策」打退了。四三年春季，我軍各部展開反「圍食」反維持鬥爭，共進行了大小戰鬥三百八十七次，收復了八百多個村莊，解放人口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三名，繳獲敵偽一千三百餘人，俘敵偽二百四十五人，剛獲軍械槍一挺，輕機槍六挺，長短槍二百七十八支，子彈一萬〇五百餘發。

人民的偉大創造力

在抗日民主政權撫育下，晉西北人民不僅積極參加了反「圍食」、反「掃蕩」鬥爭，而且創造了許多辦法，產生了許多民兵英雄，堅持並建設了根據地。

舉世出色的勞動英雄與民兵英雄張初元，他適應着敵後根據地游擊地區的環境與需要，在民兵和羣衆運動的基礎上，創造了勞動與武力結合的方式，這樣不僅節省了人工工，也粉碎了敵人搶掠糧食企圖。一九四二年敵

人給送了他們村中五十八石糧，四三年他們組織起來後，只被搶走了兩石糧。四三年全村喂了三十五個豬，全部自己吃了，沒有讓敵人搶去一個。

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呢？四二年秋天，敵人在他們村子附近安下了據點，經常來騷擾，四三年正月，爲了保衛春耕，張元元（那時他是糧食經濟委員會分隊長）就把原來的民兵組織整頓和恢復起來，最初是×個民兵，以後發展到××個。舊曆二月初，敵人剛到村邊就讓民兵打回去了，從此，民兵的威信就建立了。但，民兵經常出去活動，誰給他送錢呢？後來就在民兵中想法互助，以後在動車秋收到來時，就實行全面互助，把民兵和莊戶調成了一個組。民兵提出不讓敵人搶去一條牛的口號，變工組則以不荒一畝地的行動。早晨天一明，民兵和變工組都吃飯，飯後，民兵爬山警戒，變工組便下地開莊戶去了。

五寨民兵更建立聯防哨制度，一週做哨，各村民兵即相互支援。如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小河頭敵偽二十餘名，企圖到某村搶劫，剛走到村東土山上，被我聯防民兵發現，當即發出信號，路玉小民兵小組在副隊長指揮下，分成三組，一面巡邏敵人，一面掩護羣家轉移。敵見勢不佳，正想掉頭逃竄，我領隊民兵中隊長楊二潤已率民兵趕到，各隊民兵會合夾擊，把敵人一直逼下小河頭據點附近。

去年，交西民兵神槍手崔三娃，在保衛秋收和反「掃蕩」戰鬥中，他那個民兵中隊傷敵傷俘十六名，他在寫信給各村民兵的戰鬥報告上說：「鄉親們，民兵英雄們，現在是保衛咱們莊稼的時候了，爲了食糧不被敵人糟蹋搶走，明年春季不餓肚子，咱們來一個「一槍打死一個鬼子」的運動吧！」

過去，民兵們對武器不太重視的，自從交城離石城民兵用舊武器作戰，發揮了可觀的威力後，一般民兵除了向敵人奪取新式武器或製自己外，每人都準備了長矛，榆木砲，火槍，獨角牛等武器。老鄉們捐出了銀錢，土槍，經過了他們的創造和發明，交城民兵英雄徐力強已能製造擲彈筒，許多地方的民兵自己搜集破銅爛鐵，自己製成手榴彈來了。

甄家莊戰滅敵

我軍民反置食鬥爭的不斷勝利，使敵偽的統治區日益縮小，我根據地日益擴大。從去年年初三箇月中，各地民兵活動不完全統計，即達二二二二次之

多，在反維持鬥爭中，共摧毀敵偽村政權八八一個，建立我村政權五五五個，使敵據點活動範圍，由三四十里縮小到五里以內。

去年九月十五日，敵第三第五十九兩個旅團集敵三千多人，對我興保德地區反「掃蕩」，經過了二十餘天奮戰，在甄家莊一帶七天七夜戰鬥中，我軍消滅敵人八百多，把敵人八十五大隊主力全部殲滅，創造模範的運動戰。後來我軍更積極主動的圍攻敵據點，特別是今年春，我軍民對同蒲鐵路，神（池）五（寨）、五（寨）三（岔）、嵐（縣）離（石）、汾（陽）離（石）、汾（陽）太（谷）、忻（州）離（縣）、嵐（縣）離（石）、汾（陽）武（寧）武（化）（寧化堡）八條公路，展開敵次全面破壞，共收割電線四萬○九百十四斤。

迄至四、五、六、三個月內，六、八分區對敵鬥爭成效特著。我軍共收復了六分區的石家莊、咀于上、細腰、蒲閣寨、灣子里、黃牛、王蓋堡。八分區的上雙井、土地堂、靜游、孝子渠、莊花、義安、寧岡等，三分區的津良莊，二分區的倪家莊等三十餘據點。連以前收復的芝蘭、金口等，已把敵人插在我根據內的大據點，我除得差不多了。

生產建設運動

從抗戰爆發到一九四〇年，是晉西北遭受敵人大破壞的時期。在災荒方面，那時人的勞動力比戰前減少三分之一，牛減少十分之六，鹽鹼地十分之八九，羊減少十分之六。土地荒蕪，耕地面積僅維持戰前百分之八十四，山地產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總產量只有戰前百分之三。在工業方面，民間紡織業，隨縣原有改良機二百多架，土機兩千多架，完全停頓。

新政權創立之初，即注意了根據地的建設工作，在興辦農業生產中，政府劃劃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所有耕地不荒蕪，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減輕了農村中的高利貸的封建剝削，刺激了生產者的熱情，政府減輕了公糧負擔，獎勵生產，創造和發明。幫助貸種貸款，這一切促成了根據地的生產運動的發展。四二年和四三年開辦了生產展覽會及空前未有的勞動英雄大會，在會上研究了組織起來變工互助及勞力與武力結合等辦法。

據統計，一九四一年二十五個縣開辦三十五萬五千畝。一九四二年十三個縣開辦二十五萬畝，三年來全邊區已開辦六十萬畝，興修水地六萬九千餘畝，特別是今年的生產運動更是熱烈，在春耕中，各地羣衆已開春播四十

二萬畝，邊區部隊開荒十八萬畝。加上勞力的大批組織起來（神府、興縣勞動力組織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深耕細作，今年可增收細糧十二石以上。

農業生產中產生了張初元、馮象檢、劉文錦、劉相換等勞動英雄。他們不做自己生產的好，還組織了各村生產，推動了全區，全鄉。他們不做勞動得，而且還是各地民兵領袖，張初元在開完了勞動英雄大會以後，即積極在各村附近組織生產與加強民兵工作，細腰、石家莊兩據點被收復後，他會親往慰問。馮象檢回家後，即積極佈置、動員全自然村組織生產，不顧大雪紛飛、道路泥濘，連續數日內走遍十三個自然村，會同幹部開會研究全行政村今年生產的初步計劃。他們對窮苦農民特別關心照顧，無論平時或動軍中，只顧窮人沒辦法，他有的話都能幫助。馮象檢說：「咱是從窮人轉來的，咱知道窮人的苦，咱現在好了，就幫助窮人，也和咱現在一樣。」

工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民間紡織業經過幾年來政府的幫助，如獎勵私人投資，負擔不計母金，婦女紡織不徵稅，私人小規模紡織工廠免支抗戰勸誘等辦法，因此紡織業也飛快發展起來。目前，全邊區已有紡車五萬架，紡紗六萬人，土機九千多架，快機一千三百多架，工人四萬二千七百多人，每年可產布五十萬六千餘疋，加上出產的毛巾，能達到全晉西北軍民的衣服自給。

其他工業。造紙業一九四一年的產量，達到了戰前十分之九，四二年已超過了戰前的產量。其他手工業作坊、礦業、油房、粉房等亦有大發展。公營工業佔工業中的重要部份，一九四〇年以來，建立了修械、製鐵、紡織、化學、火柴、造纸、工具、被服、印刷、製藥等工廠，這些工廠產品的質和量都在不斷的提高當中。

四三年五月展開的張秋風運動，更發揚了工人生產的熱忱。軍區炸彈廠鑽炸彈每天平均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一般學徒亦能增加百分之十七。張秋風領導的小組，發明了試製砲彈新法。西北化學廠，四月份生產量比過去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五月份又比四月份增加生產百分之十三。

工人的創造性也大大的發揮了，如油墨、顏料、木梳床、鐵輪織布機、手搖紡紗機、油墨滾子等都一一試製成功。

郵政生產方面。一九四一年郵區部隊開荒六萬畝。三分區某族自己開油房、豆腐房、粉房、進行造纸、織布、挖炭等生產。前年該族已作到每人喂豬一口，每一伙食單位喂羊二十隻，菜蔬作到全部自給。據統計，四二年一二〇郵區生產總數達二千萬元。

黨和費的晉級邊區，人民逐漸走向豐衣足食的境地。

民主政治

自從新政權建立以來，即遵照實行民主政治的方針，積極籌備村鎮。第一次行政會議上確定了村鎮長民選的原則。第二次行政會議上通過了村鎮暫行條例與村政權組織暫行條例。經過一九四一年四二年的努力，大部地區村鎮都收到很大的成績。四二年又試辦區選。後來在這種基礎上籌備了晉西北區多會的選舉。

經過了一年的籌備，一九四二年十月晉西北區參議會召開了。大會參議員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以及抗日軍人、工、農、商、學、文化界等人士。也有滿、回、國際友人、朝鮮民族的代表。一四五位參議員中共產黨員只有四十七人，未及三分之一。

在臨參會召開的時候，敵人曾發動了對邊區區區「掃蕩」，企圖破壞大會的開幕及阻止各地參議員赴會，可是各地參議員仍冒著一切的危險趕來。如朔縣參議員紅幫領袖蔡原老先生已經是七十高齡，連日夜跋涉，走了七百里路，帶出平糶、獎券兩項包圍，到會出席。晉嵐六十一歲女參議員張蘭女雖已老態龍鍾，還騎毛驢，爬山越嶺，走了七八天路程趕到。

經過十八天的討論，大會通過了「鞏固和建設晉西北施政綱要」，「保障人權條例」，「減租和交租條例」，「救濟失業條例」，「擴大民兵，加強地方武裝以增進對敵鬥爭」等一百一十二件。選來了續範亭、武新宇為行署正副主任，賀龍、劉佑卿、張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延成、張龍芳、張軒、劉菊初、樊社如、劉德德、孫良臣、王裕、常慶五、武進卿、王法文、湯平、郭順道、梁選舉等十九人為政府委員，林楓、劉少白為正副廳長。大會選舉後，士紳參議員樊社如說：「我們的參議會很隆重，富有民主精神，大會的選舉，非常鄭重，沒有任何包辦的地方。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員也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大同參議員張登榮說：「開了這大會，聽了林楓先生的報告，我相信共產黨是真誠坦白的，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沒有了。」敵佔區的民衆聽說參議會開幕，更欣喜若狂。某縣代表林子茂在來會的路上被敵人發覺了，敵人幾次追蹤包圍了他，可是總是衝出了敵人的包圍，繞道前來，沿途轉折了半月。敵佔區參議員趙貴堯登台說：「我來自敵佔區，目睹敵人燒殺掠奪，今日看到民主選出的政府，人民親獻鮮花，心中欣喜交乘，不禁淚落。」陽曲淪陷區民衆在給參議會的布條上寫著：「我們身在敵佔區，我們心向參議會！」

新山東的成長

張森

山東地大人多，是中國會門的發源之地。會門在六十餘以上，多數是農民的自衛抗性的組織，有的甚至結成半武裝組織。許多沿海的人民更有批發門等組織，膠東的濰縣現在還可找到防禦倭寇的案卷的遺跡。民國以來，山東人與日本人結仇日深，東北淪陷，關內創辦農林切的是山東人（迄今農林條件下，膠東每年收入東北匯款約以萬計）。山東又是南北軍閥混戰的場所，長期處於張宗昌、韓復榘專橫統治下。深刻的民族仇恨，軍閥的殘暴，山大王（地主惡霸）的剝削，這一切使農民及其反抗，武裝了山東人民（民間的組織決不承認高樹勳），豐富了他們武裝鬥爭的經驗，他們無時無刻不想從這被束縛的羅網中解放出來。

抗戰爆發了，日本鬼子以前所未有的武力向山東壓來了。九月底德州失守，十月中旬魯南運河沿線，十二月廿四日濟南失守……韓復榘的軍隊被長河衝斷，動員們紛紛跳河，悲劇發生，抗戰無人領銜，山東當時正如一葉飄上颶風大浪，快與沉沒的航船，山東的人員被捲起來保衛家鄉了。

徂徠山起義

還在抗戰以前，從延安開會回去的山東共產黨的負責人，就籌劃抗日寇進攻時，如何開展游擊戰爭。敵人還沒有進入山東境內，全山東各個地方黨的組織便進入具體佈置的階段。敵人攻佔黃河北岸的時候，省委書記黎玉同志來到泰安，和有三四個黨員的泰安縣委，一起佈置魯中山區的游擊戰爭，所有的武器是一支有毛病的盒子槍，兩支「漢陽槍」，除開從山西來的一位紅軍青年幹部外，全部人員連黎同志在內，對打仗都一無所知。一九三七年的最後一天晚上（第二天敵人佔領泰安），他們和十餘平流亡的游擊隊，按照計劃，往徂徠山下的山陰村集合。這支三桿槍的隊伍便叫山東人民抗日自衛隊

第四支隊第一縱隊。這村有二十個本地同志，他早就集合了四五十個農民，有二十多條土造和三叉鋼槍在等待著，叫做第二縱隊。他們一匯合，便上山去，住在徂徠山上的一個大廟裡。當時大家所有的還只是兩條鋼槍和金石不移的決心，至於仗怎麼打，前途到底如何等等，還是有些茫然。因為力量不足，名義還不敢公開，然而周圍的老百姓卻傳開了，說：「紅軍、八路軍來了，有好幾千！」「咱們得救了！」於是幾天之內，附近一百多鄉農民，都扛着土槍、大刀、紅纜槍上來了，他們要參加八路軍，打日本，保家鄉。一個禮拜以後，他們往東走了幾十里，和同時發動的新泰、萊蕪、泗水等三個縣隊相匯合，四支隊就成爲五百人和一半有槍的不小的隊伍了。這支隊在當地官廳、良莊等地打了幾次小仗，這支隊更開火了。爲了打擊門爭和動員羣衆，又分放南北兩個縱隊分做行動。三月底，北縱隊打跑了蕪城，打到了濰縣會，……（被略一大段）。南縱隊在沂台公路的四槐樹打了個埋伏，炸毀敵人三輛汽車，鬼子死傷四五十人，這個勝仗鼓舞了魯南各階層的人民。老百姓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勝仗，他們情緒煥發，吃紅菜飯，不收老鄉送來的餽項；下雪天，「官長」的鞋子都給戰士穿，學生們打赤腳，吃地瓜也不叫苦……又與能和日寇打仗。農民對他們實在高興，都要求參加。五月間，南北縱隊又在萊蕪集中，近一千人了，都已經整齊地做好了軍裝。

（被略）

四支隊後來進入魯南，配合徐州戰役，今天就是山東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山東縱隊的第四旅。

勝利召喚了人們

濟南失守前後，韓復榘政權，軍委會別動隊，地方民團，以及各種會門搞起來的武裝組織，名稱複雜，爲數不下三百六十隊。山東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儘管絕大多數沒有作戰經驗，却有一個堅定不移的方針，團結人

和敵人緊決戰鬥，才能取得輝煌的勝利。三七年達到三八年年初，一個多月以內，共產黨的地方組織領導人民發動的抗日武裝起義，不下二三十起。

一月廿四日深夜，膠東的共產黨李琪同志，集合了十七個人，兩支槍，在寧海天棚山的小棚裡，組織了一支軍隊。不到兩個月，發展成爲六百多條槍和一千多人的隊伍。三八年二月十三日他們以十分之一的力量，晚上九十里急行軍，於第二天襲後坊鎮，佔領和平城。當即召開黨大會，將區長宋健善槍斃了。下午兩點鐘，他們在離城不遠的官神廟歇腳。敵人很快增援反攻，五輛汽車，二架飛機，共六百多人。因敵人來得太猛，兩五個主要幹部來不及撤往山中，他們就以廟內的房屋作掩護，和兇惡的敵人頑強戰鬥，一直打到天黑。他們之中有好幾個是過去農民暴動時的神槍手，於是每一窗口，每一房頂，都發生劇烈的爭奪戰。外面進入山區防衛隊，初步槍打下了一架志形低飛的飛機，擊毀了三輛汽車。有力地援助他們。他們最後衝出重圍時，李琪同志犧牲了，有十來個負傷的。敵人傷亡了五十多人，也不敢久戰，倉促撤退了。這是第一次激發膠東人心的勝利，不但老百姓，就是在徘徊觀望的地方軍，也覺醒起來並不可怕。這支英雄的隊伍，三月七日又攻佔了龍山鎮，漢奸武裝三百多被繳械，偽縣長陳景雲被俘。之後不久，他們轉清河來的起義隊伍（後來第八支隊）匯合，恰遇敵人在龍山登陸，他們就搶先佔領岸上陣地，和敵人打了一天，並用古老的土砲打沉了敵人一具小型裝甲兵船，終使敵人這次未能在龍山登陸。其他地方共產黨領導的起義隊伍，最初也都是這樣戰鬥着，壯大起來。

山東的人民是種樸而英勇的，他們根據自身的經驗，選擇了遊擊人民的軍隊作爲他們戰鬥和生存的依靠。到三八年秋，八路軍山東縱隊已略具規模，成立了九個支隊，共達三萬人左右，攻入和收復過十幾個縣城，在膠東蓬萊、黃縣、掖縣建立了最初的抗日政權。魯西北熱的組織，更幫助了「抗戰老人」范築先，開闢了魯西北三十多縣，和由一個發展到三十六個支隊的抗日局面。

在夾攻中奮鬥

山東人民抗戰的熱誠和武裝起來了，山東在歷史上第一次以全民的姿態站立起來了。敵人的飛機和浪浪前進着，然而敵人的時時防備無數的海中暗礁。

（據略八百餘字）

四一年的局面很艱難。敵人增加了三個獨立旅，配合了十二萬偽軍，「掃蕩」空前頻繁與殘酷起來，特別是十一月開始對沂蒙區兩個月的大「掃蕩」，和接着第二年春天對各地連綿幾月的輪番「掃蕩」，使山東根據地的形勢發生逆轉。基本區縮小了，敵人佔去成年的村莊，戰略區受到威脅，黨和幹部都遭受相當的損失；特別嚴重的是許多黨組織遭受摧殘。在艱難的形勢面前，形式主義、太平觀念、腐敗、麻木、組織不嚴；都露出原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以求進一步改善工作，轉變工作的基礎的深入和鞏固，必須從解決黨內的切身困難來動員和組織他們。

經過了深廣的思想動員，有一千多幹部被派下去，幫助農會開展減租減息增產運動，鼓舞和團結各階層人民抗戰，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農村生產關係。

四二年的秋天和冬天，魯民們對新來無限的興奮和喜悅，到處都開羣衆大會；討論減租減息的問題，佃戶們在農會領導下，集體到上口袋去地主家退租。魯南縣的張平莊，和佃戶關係很多，新改選的農會委員開始了全體佃戶，大家一致宣誓：「一定要退回租子，絕不交油海子。」六十多個佃戶到了農會的地主王希富家裡，有三十多個佃戶說了話，王希富即開租，只好答應退租。這一天，有九家地主都自動答應退租。

魯南縣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底四十五天中，徹底完成減租的有一六二村（包括退租、訂約、取消一切額外剝削、進行對等），減租的業主五八三戶，佃戶一、〇四〇戶。共進行了反貪污、反惡習、反官僚主義；等鬥爭一百多次，農會會員擴大到四七七一。鬥爭進行最熱烈時，攻克了惡家嶺據點，農民組織最好的白米和麵、肉、前去勞軍。魯南其他地區退租後，農民們每天站崗放哨更爲積極，對於冬學中所學的與國有，儲信等勞動英雄，感到很大興趣。有的村子還大家集資爲民長購買棉子種，作新衣褲。

除開對極少數頑固地主進行了必要的鬥爭外，農會普遍進行減租減息工作一般採取說服，調解方式。爲了照顧各階層利益，當農會人員農本按八折算負擔，不能回來的地主，政府用各種方法通知其前來領租，各地又普遍召開了土地會議。僱工提出在農時要切實幫助地主減租減息，幫助人口轉移，農主則認爲自改爲糧食工資後，僱工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了。

山東軍政專署成立後，魯中與濟南兩區在四二年至四三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完成，膠東、渤海、魯南去年大部亦已開闢和恢復完成中。山東原有的和重新動員組織起來的軍隊（民兵、自衛隊在內），去年已佔基本區人口的半數。民兵約數已達五十萬。魯中、魯南的經濟地位改善了。濱海區去年春天牧畜收佔區產米穀見六萬多，清河區收糧糧食十一萬以上。中上階層的新民主主義樹立了信譽，許多外逃地主回來了，開明地主紛紛參加了各級三三制政權與其他各種二級三三制政權。

新的英雄主義

山東抗戰軍政專署有一年以上是從敵人手中奪來的，他們對敵人作戰困難的給予缺乏，他們不得不揮汗如雨，自己設法做手工彈頭，裝上藥，翻地使用，此外用土法造手榴彈和地雷（這些，還供給民兵一部份）。但最後的裝備並不能妨礙八路軍和民兵打贏仗，他們是以新的英雄主義武裝了的，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四二年一月的膠濟鐵路戰，採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處，急行奔襲的戰術，在四個日夜戰中，我軍傷亡了七個人，然而所獲的代價呢：攻下鐵道十餘哩，俘敵官兵七名，俘敵軍六百餘名，繳步槍八百餘支。其他重要戰術物品數不勝數。

同年十一月十日泰山區的「掃蕩」中，三四千敵寇緊緊包圍了博山東部一廣狹共險要的馬鞍山，在百米外的山巔上，敵人設置了兩門平射砲，對馬鞍山的寨門，不斷的轟擊，飛機更輪番轟炸，火光、煙霧、爆炸聲，籠罩了整個山崗。山上廿八個守衛者，鎮靜而堅定地掌握着自造步槍和土砲，抵抗攻山的敵人。從黑夜到天明，他們一息不停的堅持了兩天，打死了一百多敵人。直到彈藥用盡了，山頂的碎石打完了，他們只得進行白刃戰，用槍托打敵人。領導戰鬥的主帥長將最後一顆子彈打入自己的胸膛，戰士們也先後犧牲了。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感動了在山上避難的張老先生，他向全家說：「我們不要讓兒子活捉了去」。他和女兒、兒媳、兩個孫子都隨着八路軍的英雄，跳入深崖。

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去年十一月南北低崗的保衛戰。這次保衛戰對粉碎敵人的「掃蕩」起了決定作用。距濰縣四百廿米和二百四十米的兩個高頂，敵人用三個步兵大隊，一個砲兵中隊，一個空軍中隊和一個偽軍團，一應盡

在進攻了七八天，炸彈砲彈花費了四十萬磅以上，還用了燒夷彈和瓦斯彈，而它們的抗擊者和堅持者——八路軍的指戰員九十三個人，而對敵四十倍之敵，在傷亡上却造成了十五與一之比。最後全部人員安全突圍，其中最壯烈的地龍門的保衛，八架飛機整日輪番轟炸，八個原子彈的滾滾雲霧中轟擊，交通線被炸平了，槍炮聲震天，密水洞的水缸開始破裂了，個別防空洞口塌陷了，戰士們被彈炸得拋離地面，身體被炸得裂口鼻流血，一切都翻騰起來，但是戰士們堅毅不離崗，他們只有一個決心：「鬥是我們的，至死沒有退縮，等敵人上來，一刺刀殺下去」。受了傷的堅持休息，每天緊要戰鬥的十幾個鐘頭內吃不到飯，後來幾乎喝不到一滴水。最後決定突圍時，戰士們都用驚險與憤激去聽擊敵人的解釋。

四〇年的孫莊、五井被破，四一年大佛山保衛戰，四二年對敵的，而敵人的保衛戰，以及濰口十八勇士的壯烈犧牲。……這些大無畏的精神，新的英雄主義。為全山東人民永遠流傳，永遠歌頌。

七年來山東八路軍傷亡是沉重的，總數在六萬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為幹部，百分之四十五為共產黨員（百分之數是去年的統計）。如以參戰總計，七年來連捷而傷亡而壯烈犧牲者六十餘次。山東現有兵員共七萬人，幾乎百分之百是山東人，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東人。

山東偽軍從那裏來的

（下被略八百餘字）

戰鬥的新時期

四二年以來，山東敵偽據點增至二千五百個以上，對敵總清鄉八千四百多里，公路一萬三千多里。敵人抽出一萬以上的兵力經常、發動，砲火增強，兵種增多，對山東各戰路分區實行丁前所未有的頻繁普遍的「掃蕩」。計四二年度大「掃蕩」十九次，小「掃蕩」七十九次。四三年度（第七個

年)千人以上兵力的「掃蕩」五十次，其中九月下旬開始的，二萬五千兵力的三個月輪圍「掃蕩」，敵人稱爲「對華六大戰役之一」。經過兩年的苦鬥，山東八路軍終於在去年秋季，將軍事主動權奪取過來，配合政治的總攻優勢，在一元化的領導與廣大人民結合之下，各戰時分區有計劃有組織地對敵展開攻勢，其中掃蕩了山東偽軍主力吳化文的大部，完全控制了沂魯山區，使魯中根據地連成一片。魯南經過打死對姓榮、劉四核、韓漢榮子恆等戰役，將敵人從其所控制之我中心地區完全驅走，收復了滕嶧邊，並打跑了鄒東、滕東、鄒西、鄒北邊區，收復了嶧口山區。漢南攻克嶧嶧城活捉李聖藩，完全粉碎敵人沿沐河的封鎖線，南膠保護了原來形勢，北部有新的開展。渤海恢復了小清河以南地區，摧毀了利(津)博(興)邊封鎖線，收復了冀魯邊一二分區殘餘的鬥爭局面。膠東一般保持原狀，南海方面較有開展。總計抗戰七週年，山東八路軍共攻克據點八百餘處，解放村莊八千餘個，人民二百五十餘萬，收復地區三萬平方里以上。

在軍事和行政上，山東目前分爲五個獨立區域：魯中、濱海、魯南、膠東、渤海(冀魯邊與清河合稱)，共設有十七個專署(據最近材料，濱海又新設二專署)，管轄了九十五個縣政權(包括新縣政，海陽一城尚在我手)和一千三百五十萬人民(和全區總人口二千九百萬)，我們現在所指山東根據地，其範圍是津浦以東，北迄天津與冀東銜接，南至臨海路與華中××軍爲界。除渤海區爲遼國的平原外，其餘各區均爲羣山起伏，間有小塊盆地。總其間，其中沂蒙山區則成爲堅持山東抗戰的中心，南可協助魯南、濱海、北(東)可支援渤海、膠東。在濱海、膠東、渤海三區，尚有八路軍所控制的七〇〇多里海岸線，其中有某些港口可停泊船隻。

一年來的勝利攻勢，山東根據地形勢已大爲改觀，大部已恢復四〇年狀況，並有新的開展，掌握了某些戰略支點，部份改整了過去被嚴重分割封鎖的局面，相當縮小了敵人佔領區。但敵人兵力甚強大(敵爲兵力在廿萬以上)，戰略強弱的基本形勢並未改變。敵人的機動力較前更有增加，因此，優勢兵力「掃蕩」的突然性必然會增大，其手段也將更加殘酷。某些地區也仍有被分割圍攻的可能，困難尚未過去，還有一段更加艱難的路程。今天山東的任務是鞏固已得勝利，生息自己力量，不失任何打擊敵人的時機，粉碎敵人更瘋狂的進攻，熬過最後難關，準備迎接最後反攻的新的鬥爭局面。

(上接第八六一頁)

一九四三年中，敵對我「掃蕩」的規模與殘酷是空前未有的，如黃河的「掃蕩」東莞，十餘路寇軍的合圍冀安沿海地區，五千人的圍攻中山等等，都一一被我擊退。敵每次作動後總宣佈「共匪已被消滅」，「王作亮被擊斃」等等騙人的消息，老百姓是明白的，不用多解釋，敵人下一次「掃蕩」的行動中，王作亮又會在敵人公報上出現的。

經過大規模的「掃蕩」，一九四四年春敵寇開始了「清鄉」，以五十七師二旅，配合偽軍東線精銳大部(四四師)，集中於廣九路西側向我東(莞)、寶(安)地區「清鄉」，並以武吉長陳春圃爲首成立了「清鄉委員會」，組織了「清鄉宣傳團」、「政治工作團」，配合偽偽武裝，進行特務活動，我東江部隊以更靈活敏捷的方針迎擊了這種新的鬥爭環境。一方面配合廣大的人民堅持着原有陣地，打擊敵偽的「清鄉」部隊及特務；一方面則以主力挺至敵後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向敵之交通線展開出擊，曾兩度攻入廣九路林村車站(一月四日與二月四日)，二月四日突襲橫瀝火車站，二月十五日與二十九日兩度平湖火車站，二月十三日將廣九路寶安段破壞，尤其是五月廿一日突襲九龍市炸毀敵鐵橋，燒毀了香港、九龍間空前的煙筒。在我強有力的內外進攻下，使敵偽之「清鄉」毫無進展。

東江游擊隊不斷的在敵偽和... 毫無進展。這一切困難和障礙都克服了。而且本身還在不斷的壯大中它在戰爭中已鍛鍊得更堅強。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東江抗日游擊縱隊，通電全國，發表宣言，接受中共中央訓令，正式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東江縱隊」，以曾生、王作亮爲縱隊正副司令。

今年以來游擊活動更趨積極，不斷向廣九路沿打各要點展開破壞，更進一步辦法，營救淪陷香港的回國友人。如今年二月下旬我軍在九龍爲救一英軍人員，與敵偽激戰四晝夜，後來又粉碎了敵偽千餘人的海陸合同。四月上旬，突襲香港，救出了印度士兵十七名。五月二十六日，我軍在香港附近大皇洞營救五位英海軍陸軍，將其護送至大後方醫院。據不完全統計，淪陷地區的國際友人經我護送脫險的已有六十餘人。

現在東江抗日游擊縱隊，東連海陽，西至三水，北達廣州，南迄大海，總面積約六萬平方英里，總人口約四百五十萬以上。在抗日根據地中，各級政權已逐漸建立，各種黨團組織(如抗日互助會等)，已普遍於村鎮中。在抗抗日政權直接領導下的羣衆已有一百餘萬。

中華解放區的對敵鬥爭

論解放區的軍事，有武裝、大別、大洪、桐柏、鄂東、黃山、天柱、天目、茅山、大別山脈等。中為長江三角洲，皖中和湘漢三大平原，而華中平原（即長江三角洲）則為如蛛網的大小河流所交織。湘漢平原是湖沼區，皖中平原是在狹長的長江沿岸。在淮北蘇北則為平原。我抗日游擊隊是馳騁在這廣闊無垠的平原上，艱苦地堅持了六年以上的抗戰。

華中交通的爭奪為全國之冠，鐵路有津浦、膠濟、京滬、蘇嘉、淮南、浙贛、江南、粵漢、滬杭兩路諸路縱橫交錯，津浦路將淮南唯一的山區割裂，平漢路給予第五師部隊之機動以莫大助，江南路增加了我江蘇、江北聯軍的一道障礙，而甬海路則在華中敵後兩大戰線間形成一道鐵柵。公路交通四通八達，尤以蘇南最為發達。華中敵對領之交通線，總長約三萬餘公里，成為敵偽向我「掃蕩」奔襲的動脈，與掠奪敵後物資的吸血管。大小湖泊，星羅棋佈。長江、黃河、淮河、運河、漢水諸大水帶貫穿其間，都是對抗日軍的天然封鎖網，長江橫貫東西，使我江南部處於比較孤立的環境，運河由北直下長江，給我蘇皖敵後東西聯繫以相當的阻礙，七年以來，敵寇憑藉這便利的交通網，來對領與分割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但我游擊隊配合人民，實行常規的改造地，築堤壩、挖運溝、破公路、埋地雷，使敵之企圖歸於失敗。

華中沿海區，在中國經濟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農業上華中是中國最富饒之區。江蘇棉花居全國第一，湖北次之，皖中與湘漢平原的米糧生產冠全國，素有中國穀倉之稱，中國最大的米市蕪湖即位於其間。在工業方面：華中是中國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地區。浙江一帶，是各種企業集中之地，蠶絲、紡織、麵粉等業都是全國第一。年來敵寇採用各種欺騙手段奪取了所有的工廠，並以此來作為釣餌，向中國抗戰陣營內的動搖份子進行政治的誘降。我抗日游擊隊歷年來與日寇爭奪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在廣大農村中展開了保衛春耕、秋收、冬種、冬藏的運動，使敵之搶掠遭到極大的阻礙與打擊，因此華中敵後經過了七年艱苦的戰爭環境，但我根據地仍然得到了某

種程度的自給自足，這對我堅持華中抗戰是極有其重要的意義的。

華中解放區，位於中國最富饒的中部，在江淮河漢之間，東臨大海，西屏武當，南迄浙贛，北涉魯豫，包括了江蘇省的絕大部份、安徽、湖北內大部份，以及河南、浙江的一部份。這個地區（僅論解放區）面積就有一百二十餘萬平方公里，人口六千餘萬。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我抗日軍分佈於八大根據地：

蘇中區：位於江蘇中部

淮南區：位於安徽東部，及江蘇一部

蘇北區：位於江蘇北部

淮北區：位於安徽東北部及江蘇西北之一部

鄂豫皖區：包括湖北省東部、中部及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之淪陷區

蘇南區：位於江蘇南部及安徽之一部

皖中區：位於安徽中部

浙東區：位於浙江東部之淪陷區

現在華中解放區，共有七個行署，一個浙東軍政民聯合辦事處，二十個以上的專員公署，一百四十七個縣政府，在這些政府轄下有三千萬人民，五十五萬的武裝民兵和十八萬以上的精銳的主力軍。自從一九四二年華中局擴大會議以後，各戰略地區都徹底執行了精兵簡政，統一領導，精兵簡政，發展生產等政策，使黨內外人士更加團結，同時也大大地節省了民力。提高了人民戰鬥的情緒，使我華中根據地的對敵鬥爭，有了堅固的羣衆基礎。在華中解放區，展開了普遍的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運動。從軍事鬥爭中徹底改造了各級政權，與敵寇執行了三三制，各抗日階級人士均被吸收到民主政府機關來，使人民在艱苦的戰鬥環境下能安居樂業，生活一天天的變好。我們地區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羣衆已經組織起來了。這來性的對敵武裝鬥爭亦隨之運動開展，使抗日政權更趨鞏固。在蘇中，我們執行了新地制，

活躍在珠江三角洲的游擊隊

張 棧

在華南敵後戰場上，有一支抗日的人民武裝隊伍，和敵偽軍進行着不屈不撓的戰鬥，這就是活躍在廣九路側與珠江三角洲上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它的作戰地區包括廣東的省城廣州及寶安、東莞、惠陽、中山、順德、南海、三水、番禺等縣和九龍半島。廣州、香港的敵人感受它的嚴重威脅。現在它已壯大成爲一支擁有幾千人的武裝。

現在這個支隊，和瓊崖的抗日獨立游擊縱隊，再配合着廣大民衆抗擊着敵寇一個師團，一個旅團及廣東偽綏靖軍五個師及海南島全部偽軍，控制了數百里的海岸線，威脅着敵人佔領的香港、廣州等重要城市。五年餘來，華南我部共與敵偽作戰數十餘次，粉碎了敵偽近二十次較大「掃蕩」。它是堅持華南敵後抗戰的唯一力量。

東江抗日游擊隊，誕生已經六年了，在它的發展史上，會經過一些勝利和挫折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敵軍由大亞灣登陸，直犯惠陽，當時惠陽的守軍，在敵軍未到以前，已倉猝撤退，惠陽、及廣九路側地區，就陷入了非常混亂的狀態，敵寇便因此長驅直入，毫不費力的佔領七天工夫佔領了華南的最大城市——廣州。敵偽殘酷的破壞騷擾，使得這一帶的人民大衆，深深感到有武裝起來保衛鄉衛的重責，於是他們就挖掘了過去埋藏在地下的槍枝，拾起了滾車手下的武裝，來武裝自己。

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三八年年底當敵軍進攻廣州時，虎門要塞的守軍撤退了。把面滿堆積槍枝砲彈，眼望着這些武器要落入敵手，虎門砲台的守軍便泅水過去，把十九挺輕重機槍擡了出來武裝自己，把砲臺統統弄到海邊。

第一支人民抗日游擊隊伍的參加者，有香港的工人，有當地農人，有學生，也有過去散落在東江一帶的紅軍游擊隊，他們的領導者是過去在香港作

工人運動的會生同志。這一支一二百人的隊伍，從三八年十一月起就在惠陽一帶參加了戰鬥。三八年年底他們威脅敵軍退出了惠陽城，提高了廣大人民的抗日情緒，堅定了他們勝利的信心。不僅廣大工農羣衆踴躍參加這個隊伍，就是各階層的抗日力量，也願意接受他們的領導。

(被略二段)

後來，該部自動挺進廣九路兩側抗敵，與寶安、東莞等地共產黨東莞縣委王作堯同志領導下的一支游擊隊聯合起來了。到一九四一年，這兩支隊伍，正式成立了東江人民抗日游擊縱隊。

對於這支新生的力量，敵人曾發動了無數次進攻，一九四一年敵寇曾以二千餘兵力配合偽軍不斷的輪番進攻，都被我軍及民衆打退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原來駐在廣州的敵軍配合一部份登陸部隊，由博羅進攻香港。這時東江游擊縱隊以積極的行動，配合英軍進行香港保衛戰。我軍除了在鐵路線上伏擊敵軍，破壞敵人運輸外，更挺進九龍，給敵人後方以有力的打擊。那時香港一帶盛傳中國游擊隊攻入深圳，就是指的這個部隊。

港島淪陷，東江游擊隊更出死入生的給敵偽佔區的國隊友及同胞、僑商等。許多政府人員，文化界人士及僑商，逃進大鵬灣等地避難，經過東江游擊隊的保護，安全的抵達內地。事後，許多國隊友及同胞都寫信去感謝他們的保護，並請派員回國的協助行動來報答他們。

一九四三年後，面對着抗戰形勢的不断发展，更感迫切，對游擊隊的行動，更感威脅。敵寇的對策，除了顧慮我軍，更感威脅我軍的兵力，由兩個師擴大爲五個師，以便向我軍進攻外，並且將華北軍中的「偽滿」、「清鄉」辦法，用之於華南。

(下接第八五七頁)

論文學中的人民性的問題（中）

顧爾希坦作
戈寶權譯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諸問題」的一章——

五 人民性的內容與尺度

來自拜林斯基起，就已經將人民性和大眾性兩者區別開來。在這一點上，對人民性東西、對人民大眾絲毫都沒有輕蔑的地方；相反的，却將那種存在於表面的外層的、靠經驗得來的東西，和那種隱藏在人民大眾之中包含着深刻內容的東西，作了一個顯明的完整的而具有重大意義的區分。這樣的一個觀點，就使得拜林斯基得出一個結論，說普式庚的「歌根·奧涅金」，「可以稱爲是部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並且高度地講起來是部人民的作品」。用拜林斯基的話來說，普式庚的詩篇，「是對於俄國社會的一個認識上的判決書，並且差不多是第一個判決書，因此這對於它是向前跨了多麼大的一步！……這一大步是巨大的規模，從此以後，要停留在原有的地點上，那已經是不再也不可能了……」（見一八四五年的一篇論文）

同樣地，杜布羅留波夫也將人民性的內容和形式分開來。他認爲人民性的形式，是人民生活的現象和周圍的環境，所謂把這些人民性的形式，這意思就是說：善於「描寫當地的大自然的美麗，善於運用從人民中間搜集來的確切的表現語法，善於真實地描寫出風俗，習慣等等」（見「杜布羅留波夫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二三五頁）。當然，這還不夠，「爲了要真正地成爲人民的詩人」：這個詩人就應該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內容。

任何一個作家的人民性的尺度，要看他在自己的創作中所反映出的人民生活的內容的深淺程度來決定。深刻地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內容，這不僅僅是寫現實作了一幅廣闊的和真實的圖畫，還要從正確地瞭解人民的興趣的觀點

，光顯出這個現實，光顯出在這個現實中所發生的深刻的、時常是肉體所不能看見的過程，和表現出人民的艱難困苦與希望。一個作家的人民性，也要由他反對剝削與壓迫的鬥爭、反對那些阻礙着人民發展的壞了時的社會形式的鬥爭和對於將來的預見的程度來作決定。在一個偉大的、真正的人民作家的創作中，所有這些要素都用綜合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在另一些作家的創作中，則是用片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然，其中可能有各種最不相同的結合。這樣就可以解釋清楚我們所提出的人民性的尺度的問題了。

在確定一個作家的人民性時，我們時常傾向於只重視這個作家的出身的表徵；我們常說：一個作家被稱爲人民的作家，因為他是出身自人民的底層等等。毫無疑問地，一個從人民當中出身的作家，和他們過着同樣的生活，深知他們的生活艱難困苦，就會把人民性帶到自己的創作中去。但是文學中的人民性這個概念，是更加廣闊，是更加重要。因爲此處所講的，已不只是表現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艱難困苦的問題了。舉如杜布羅留波夫在講到科爾促夫的人民性時，他同時又指出他的限制性，因爲科爾促夫是遠離開一般的興趣，並且他的詩歌的「觀察的深透性」是不夠的。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則在藝術文學中看出了人民自覺性的表現。真正的人民性，它的高度的表現，在於這種種人民的自覺性。在此地，我們自然地會想起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所講的那段有名的話：社會主義的學說怎樣成長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的意識是怎樣成長出來的問題。

列寧這樣寫道：「我們說過，工人們自身，是不可能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的。它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鍛鍊出工聯主義的意識，這就是說，只相信必需組織工會

必需與業中作鬥爭，必需要求政府頒布某些工人所贊成的法律等等。社會主義的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代表人物——知識份子所製造出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講，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階層的。在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的產生，是與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完全無關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的思想發展之自然的和必然的結果」（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三八四—三八五頁）。

列寧的這段話，可以一般地應用到人民自覺性的增長的問題上去。有些批評家，他們只在像科羅傑夫、尼吉丁（註一）這樣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出了人民性，但是他們忘記了一點，就是人民的自覺性在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們的創作中得到了顯明而深刻的表現，這些作家和人民雖然沒有直接的接觸，而是他們「從外面」（用列寧的說法），把他們藝術的創造思想都獻給了人民。高爾基的話真是千真萬確地對，他說只有人民，才是整個創造的藝術大師和永遠汲取不盡的泉源。但是，偉大的藝術家們在汲取這個泉源時，他們經常是以百倍的東西還給人民，拿出最高的無感思想所豐富了的、拿出來人類豐富的藝術文化所孕育出的自己天才的創造物，來還給人民。

歌德的「浮士德」，是根據中世紀的民間傳說而寫成的。但是歌德用獨創的改造方法，總理了這個古老的傳說，並且將人類思想的整個豐富的來源，都加進到這個傳說當中去了。難道我們因此就說：歌德和那個中世紀傳說的無名的創造者比較起來，是更少帶有人民性嗎？普式庚當鄉居的放逐期間，常在漫長的冬夜中聽阿林娜·羅地翁諾夫鄉講故事（註二），這些故事後來被他用筆寫出來，成了我們詩歌中的瑰寶，以全部豐富的詩意的語言在閃爍着光輝。為什麼要說普式庚的這些作品，比起他的奶娘的故事更少帶有人民性呢？普式庚在出身上、教育上和地位上，是一個貴族，他和人民共通的地方，主要地還是想像上的。但是他他自己的不朽的作品裡面，爲俄國和俄國各階層的人民，作了一幅廣闊的圖畫，從奧涅金和蘭斯基（在某種情形下，這位詩人會像「里索耶夫」一樣地被殺死的），一直到無名的「騎姑長」和沒有帶帽子，在「臂下揹着一個小孩的棺材」的可憐的農民爲止。普式庚因爲史傑濟·拉辛是俄國歷史上最富於詩意的一個人物，他企圖幻想出俄羅斯人民的過去，並且傾瀉特別的興趣，注意那些當人民作爲歷史的主

體而出現的時候（註三）。最後，普式庚還又帶着不安而緊張的心情，讓讀者前方，展望將來，想猜測出人民的命運，這些人民將會「在專制的廢墟上」蘇醒過來，向着新的生活前進。拜林斯基曾經多次回到「普式庚與將來」這個題目上去，這並不是偶然的。在所有這些地方，是否存在着新人民性，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和崇高的人民性呢？對於這個問題，只能有一個回答。普式庚「從外面」發展了和豐富了人民的自覺性。我們靠了普式庚的創作的具體的歷史特點，就能確定出他的人民性的尺度、深度、以及「階級的」眼界。不僅那些直接來自人民的東西，我們應該稱之爲人民性，就是那些爲了人民的東西，（甚至是「從外面輸入」的東西），也是人民性的。因爲，在這裡，我們感覺到人民大眾的永不停止的生命的氣息，和人民大眾的強有力

六 怎樣才能正確地瞭解人民性這個概念

這自拜林斯基起，就指出了人民性和現實主義之間的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在近代史的黎明時期，在文藝復興的時期，更特別可以感覺到，這時的人道主義起來代替了古代和中世紀的神話與宗教的意識。還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中：就存在着廣大的人民的世界，在這裡，現實主義已經達到了它的現有的偉大而壯麗的高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莎士比亞的現實主義中，看出了廣大的人民運動的藝術體現的線索，這並不是偶然的。「啓蒙學者們」則創立了現實主義的美學的基本，而這一點，是不能不和啓蒙運動的另一個特點相聯繫起來的，用列寧的說法，後面的這一個特點，就是「……維護人民大眾的利益，主要地是農民的利益（他們還沒有完全得到解放，或者只在啓蒙學者們的時代才得到解放），真誠地和信譽除農奴制及其殘餘，將會帶來普遍的幸福，並且真誠地願望促進一件事」（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三一四頁）。

在帶有着全世界普遍性質的古典主義後面，人民性只能以最抽象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由浪漫主義所培養出的對於人民詩歌的興趣，對於「Corneille」（地方色彩）的愛好，則用片面的形式，引起了大家對於人民性的興趣，並且在文學的基礎上起了一個走向現實主義的橋樑的作用。這樣

直到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勝利的時候，由於民族性質的現實主義的小說被確立為文學創作的領導形式之一時，才為文學中人民性的發展，開闢了一片最廣闊的疆地。在批評的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品中，人民性則更有力量地表現出來。人民性在文學中已經成了一個作品構成的起點，杜布羅留波夫有一篇文章，即題為「論俄國文學發展中人民性參與的程度」(一八五八年)，這決不是偶然的事。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家們的前面，現在有一個最廣闊的任務，就是要從這個觀點，來考察整個藝術文學的發展。

但是我們要預防人民性認識中的相對論的看法，這種相對論，在某些研究家的「集團」的發言中，是更加顯明地表現出來了，這個「集團」自視為是個「有力的」集團，並且還自稱為「恩潮派」。在我們想寫文章開始時，我們已經經過里夫希茲、凱曼諾夫等同志的著作中的「新民主主義」的傾向。在目前的階段上，這個集團提出了一些新的口號；他們憤然地和熱心地擁護反對「偏見」在太陽下面有存在的歷史權利；他們寫了許多很長的文章，想證明出一個論點，就是反動的世界觀，不僅是和藝術創作相居共處，並且還是藝術創作發展的一個很好的基地。當大家熱烈討論盧卡契關於現實主義的著作時，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文學報」的篇頁上所寫的文字，更是清清楚楚地表現出這一點。為了迎合這種「偏見」，為了迎合這種反動的思想，就創造出新的人民性的「理論」。我此地所指的，就是凱曼諾夫所寫的一篇文章：「列寧與藝術中的人民性的問題」(見一九四〇年第六期的「蘇維埃藝術報」)。

凱曼諾夫在此地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他寫道：『偉大作家的藝術中的人民性，不僅僅反映出大眾的意見，也反映出他們的偏見』。什麼東西需要凱曼諾夫有權作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得出一個用之於所有「偉大作家的藝術」的普遍的規則呢？拜林斯基這在一百年前，就已經很好地區分人民性和大眾性，而現在凱曼諾夫同志則一定要把人民大眾的「偏見」，包括到人民性的概念中去。凱曼諾夫同志也正像「恩潮派」中的他的其他同伴一樣，沒有了「偏見」就什麼事都毫無辦法似的。這並不是說，在人民大眾中間就沒有偏見和夢想；列寧在論托爾斯泰的幾篇著名的文字中所講的，正是千百萬俄國農民大眾的這些偏見和夢想。這些偏見和夢想，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得到了真實的矛盾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和抗議與不滿的自發的情緒相並列的)

。但還是不是說，列寧就正像凱曼諾夫所斷言的，「指出了人民性的嚴重性呢？」列寧指出了某一定的人民大眾在某一定的歷史時期的矛盾性質，但是我們不能說「人民性」這個範疇本身，在列寧的心目中，就成為「兩重性」的呢？

第一，我們不應該忘記，列寧所說的只是民族社會的農民。在當時的俄國各種條件之下，它的數目雖然很龐大，但不能把它和整個人民的觀念混雜起來。我們不知道凱曼諾夫同志怎麼看法，把列寧是把工人階級也包括在整個人民的觀念中的(恩四)。第二，人民性並不是決定地包括各種人民所特有的一切東西。假如在講到人性的時候，我們希望凱曼諾夫同志把俄國創作者、社會的罪人和低能兒等許多人的否定的本質，從這個概念中剝出來。為什麼凱曼諾夫同志一定要把人民的意味包括到這個概念中去呢？在凱曼諾夫的議論中，他所代表的那個「恩潮派」的特有的主觀相對論，是用赤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凱曼諾夫反對把人民性的瞭解作為一個肯定的範疇。他還從人民性的概念中抹掉值得評價的要素。可是人民性這個概念，永遠不會失去它的價值評價的意義。列寧和斯大林正是這樣理解了人民性的。恩格爾也同樣認為人民性，是「一切藝術的最大的光榮」。

我想凱曼諾夫同志對不該實備我們是過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人民的意味在某一定的歷史時期，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中也有落後的成份；至於在講到工人階級的意識時，凱曼諾夫同志為什麼要把這個階級的其他階層的概念也包括進去呢？我們的導師——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教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儘量進步的意識，也儘量先條條，因為這便先條條，正表現出這個真正的傾向，表現出它的本質。

因此，在確定人民性時，我們應該要拿人民大眾的創造力所創造出的，那些那些表現，人民大眾的真正的利益和進步的集團所創造出的，最先進和最進步的東西，作為出發點。凱曼諾夫同志的落後性(並至這種落後性已成爲廣泛的普遍的現象)的作家，不能說是更富有人民性的；反而那些向於前方邁進，並至在他們的和人民中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的藝術家，却是更人民性的。杜布羅留波夫在苦痛的時候，曾回顧了一下文官的俄羅斯，他這樣寫道：「我們的人民的作家這個響亮的稱號，完全是杜撰的；愉快的是，普式庚的藝術家性，荷科夫斯基的迷人的詩歌，傑爾渣文的高長的演說等等，都是與人民無關的。較得更廣

一點：甚至連果戈理的幽默和克羅索夫的機素（註五），也完全達不到人民心中」（見「杜布羅留波夫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二一〇頁）。但是人民性還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於偉大藝術家的作品中，甚至當他們的藝術還不能成爲人民大眾所擁有的話。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時常比人民的東西在人民大眾意識中間成熟的時期，更早些看到和體現出它。這樣的藝術家是個公告者，是個戰士，是個導師。這樣的藝術家，就完成了偉大藝術的真正使命。

七 談各種曲解形式的人民性

我們時常將人民性和幼稚性、樸素性及直接性混淆起來。這說明了在古代的人民創造的著作中，是真實地有過樸素性。但人民並不是永遠停留在一個地點，人民是隨着時間的移動而前進，人民是在成長的。人民在他們向前更進一步的發展中，當回想起古老的人民詩歌時，是把它們當作童年時代一樣地回想的（真實地，是把它們當作一去永不復返的，因而也是具有着一去永不復返的美麗和魅力的童年時代回想的）；當人民把它們作爲童年時代回想起來時，他們就是這樣去估計它的。

人民時常懷着優越的感覺、展望前途的感覺，和將今天與往古分開來的那種距離的感覺，來回想起古老的人民的詩歌；但是人民自身所具有的這種歷史發展的感覺，舉如，在保守的浪漫主義者們看起來，是覺得不足的（後來的民粹派也是這樣的）。這些帶着中世紀異教崇拜的浪漫主義者，他們對於人民性的不完備的形式有着特別的興趣。這些凍結了的形式，把生動的、不斷發展的和有着多樣表現的人民性，從他們掩蔽開。

差不多就在同一個時候，海涅（他在一八三三年寫成了論「浪漫主義派」的文字）和年青的恩格斯，就起來反對保守的浪漫主義。海涅惡意地說謊了浪漫主義者對於樸素的「人民性」的青春的崇拜，他把自己的箭頭轉向了捷克（註六），並且講出了一個關於老廚娘的故事，說這位老廚娘利用女主人不在家的機會，渴乾了這位永遠年輕的女主人所收藏的一罐子腐漿。這種異常的腐漿，立即在這個老廚娘的身上起了作用，把她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小寶貝。恩格斯則責備浪漫主義者，說他們一方面在復興真正的人民詩歌，而同時又崇拜中世紀的宗教的迷信。二十年後，杜布羅留波夫也同樣批評

了茹科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這樣寫道：「茹科夫斯基（在「斯威特蘭娜」一詩中）只歌頌了一種俄國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就是人民的迷信。」（見「杜布羅留波夫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二三三頁）

托爾斯泰的「生活簡單化」的思想，和人民性的距離是無限的遙遠和無關的，因爲人民在進一步發展的運動中看見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在復興和保存舊形式中看見了自己的幸福。人民在自己歷史的黎明時期，創造了對於自然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各種樸素的信仰，但人民是不斷地在成長着，漸漸地他們就揭開了它們的秘密，並且學會了把這些秘密服從於他們的指揮。人民的藝術創造，是它們不斷增長的自覺性的一個最明顯的形式。我們常講起人民的智慧，它是由幾百年幾千年的生活經驗，和歷史發展的久遠路程而達到的。把人民性和原始的東西混爲一談，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妄想，或者是種唯美主義的傾向，它是使人民性神秘化和曲解人民性的一種形式。真正的人民性，包含着生動的、發展的、和不斷改變的人民生活的最豐富內容。

神秘化了的和曲解了的人民性，是有着各種不同的表現。舉如其中就有着各種不同形式的「救世主義」，他們最相信宗教的神秘的計劃，有時也相信歷史的寓言性的計劃。像密茲凱維奇，俄國的斯拉夫派，和猶太人彼里克的「救世主義」，就是這樣的。創造了形而上學的、先驗主義形式的人民性的杜特契夫，則寫過這樣的話：「用理智——瞭解不了彼里克，用尺寸——量不了一切的東西。」（註七）

一八八〇年莫斯科舉行普式庚的銅像揭幕典禮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說，其中歌頌了普式庚的泰姬雅娜（註八），由於她負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宣傳的那種苦難的責任和「訓良」，因而宣佈這是俄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的特點。可是普式庚本人却完全是反對崇拜受難的，因爲他並不能爲奴役的制度找到任何一種辯護。俄羅斯人民的「多年的忍耐」（杜特契夫也這樣講），並不是一個天賦的「本質上」的範疇，而只是一個歷史發展所限制的暫時的特點。俄羅斯人民的「訓良」，這是一種虛構、假話，它正像我們今天的布哈林派，對俄羅斯人民所具有的「奧布羅莫夫氣派」的誇讚，同樣是爲造的。俄羅斯人民已經和我們國家的其他各族人民，一齊揮掉了奴隸的鎖鍊，完成了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普式庚的演說裏所用的那種民主主義的詞句，以及經常向人民的控訴，掩蔽掉它的深刻的反動思想。而當普式庚用權力的

這道出被異化了的人民是「奴隸」的時候，以及當他用他所有的詩歌衝破了「轉向歐洲的電子」的時候，他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瞭解人民性的任務的（註九）。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民性和他反對外國反對異族的意見聯繫了起來，而實際上真正的人民性，是最國際性的；「自己的」和「他人的」問題，並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對立，而完全是另一種的、社會的矛盾對立；自己的，這就是站在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方面的東西，他人的，這就是站在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方面的東西。

人民性的各種歪曲形式，是數也數不盡的。列寧曾經不斷地粉碎了民粹派對於人民性的不正確的瞭解，他們把人民生活中那些過時的形式，當作偶像崇拜，再企圖把它們加以聖化。像在格萊布·烏司潘斯基（註十）這樣的一個作家的創作中，開始出現了真正的人民性、真正的生活，而這種出現之成為可能，是當他戰勝了民粹主義的虛偽公式，是當他擺脫了這些公式，而不是當他生息於他們的權力之下的時候。和民粹派的神秘主義相對立的，就有真實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是想把人民性和當前的各種概念與觀念混為一體。

關於文學中的神秘化了的人民性，就必須排除那些純文學性的神秘化了的現象，特別是當作家用人民的形式（民俗文學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作品時。我們可以舉出這樣一些著名的例證，譬如邁克爾松偽造的戰相的作品（十八世紀），譬如梅里美的「古斯拉」（La Guzla）詩集（一八二七年），而普式庚「西斯拉夫人詩歌集」，大部分就是取材自梅里美這本詩的（註十一）。在此地，就已發生了一個文體的問題，而它的重心，則從內容的人民性轉變為形式的人民性了。

因此，我就想借這個機會稍微講一講形式的人民性。我們在此地必須首先指出，形式上的人民性，和民俗文學性，並不是兩個相同的概念。當民俗文學的形式作為藝術表現唯一的一的人民形式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我們應該記得，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講的藝術中的人民自覺性的發展，是和它的各種表現形式的發展並行的。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發展着的民俗文學的形式和藝術的個人的形式之間的距離，是愈來愈小了。藝術的個人的形式，在另一方面，從它的本質上來講是已成為人民的形式了。

普式庚的形式是不是人民的呢？和普式庚同時代的批評界，無論是最嚴厲的還是友好的，立刻就發現了他的一個弱點，就是他在形式方面使讀者接近於人民的形式了。「羅斯朗和露德米娜」的出現（註十二）（「引」）「歐羅巴通報」的惡意的批評，他則說：「在崇高的作品中，……插入了……一個長篇，披掛外套，穿草鞋，用高聲叫喊的人」。在形式方面，人民性應該是經常和素樸相並行的（不是和原始的形式，而是和偉大的素樸相並行的）。在普式庚看起來，達到這種素樸的一個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將詩句置於近於生活的、日常會話用的語言。並不是說這就是唯一的方法，這同樣也不是說，聲語是和人民性無緣的（雖然聲語是早期的人民性的形式的特色）。亞理士多德並不重視詩中的短長格，他這樣寫道：「短長格比所有的韻律，更接近於會話用的語言」；但是普式庚之所以愛短長格，正是因為它們的這些品質。用這種韻，容易描繪出「佛拉曼派派的斑斕的塵埃」（註十三），容易畫出樸素而又嚴峻的俄國風景：

「……多砂的斜坡，
在小小的茅舍前長着兩株山梨樹……」

實際上，內容的人民性，並不時常都是和形式的人民性相並行的。我們時常在作家身上發現內容的人民性，但是發這種人民性的表現的觀點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些作家在和人民的表現的方法上還有着很大的距離。像科科夫斯基的形式的演變，就是一個最富有教訓的例子。

毫無疑問地，在早期瑪雅科夫斯基的創作之中，我們發現了所謂「困難的形式」的成份，這是許多個別的文學影響的積累。瑪雅科夫斯基的思想上的演變，也反映在他的詩歌的形式上。當他愈深刻地愈完整地表現出全體人民的情感與思想時，他在形式上也更加人民化，更加接近素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所欲表達的詩意的思想，也更加「真實，簡短，扼要」。

（註一）尼吉丁（一八二四——一八六一年），俄國詩人，受科爾促夫的影響甚深，其詩多歌詠人民的貧困，奴役制度等，晚年的詩歌因受了六十年代杜布羅留波夫及其他啟蒙者們的思想的影響，已充滿了革命的熱情，代表作有「富農」，「馬車夫之妻」，「農夫」等。

（註二）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是普式庚的奶娘。此地的放逐，係指普式庚自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期間被幽禁於其故鄉米哈伊洛夫村。

而言。普式庚曾將他所聽的故事，寫成許多故事，如『金魚和漁夫的故事』、『沙皇羅丹丹的故事』、『牧師和工人鬥爭的故事』及『金雞納的故鄉』等。

(註三) 奧涅金和蘭斯基係『奧涅金』一長詩中的人物，後者是那個青年詩人，在利奧涅金決鬥中陣而死。奧涅金是與普式庚同時的一位十二月黨詩人(一七九五——一八二六年)，自加十二月黨起義，事敗，被流放。『蘭斯基』是普式庚所寫的一部長詩中的主人公。普式庚是十九世紀的一位民主革命家，曾參加過『十二月黨』的起義。

(註四) 原註——在列寧著『國家』，此句原係指普式庚而言。民衆，因為它『在爭取人民自由而爭取來自由』。普式庚在『國家』中，已證明出它有所爲。這句原係指普式庚而言。普式庚是民主主義的詩人……(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四〇二頁)。

(註五) 茹科夫斯基(一七八三——一八五二年)，德國若文(一七四三——一八一六)，他是普式庚之前的大詩人。克尼希夫(一七六八——一八四四年)是位實業家。

(註六) 柳克(一七七三——一八五三年)，德國的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同時又是德國浪漫派的中心人物。

(註七) 勃茲羅維奇(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年)，波蘭大詩人，著有長詩『紳士泰塔烏希』。斯拉夫派是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一種思潮，和當時的科學、拜林斯基等人所代表的『西歐派』對立。他們認為俄國是個特殊的國家，應該按照自己所特有的歷史路綫發展；認為未來是屬於俄國，而不是屬於其他任何民族的，並且俄國民族不應該借助於西歐的文化，只應該發揚俄國在俄國人民大眾中間的東西。杜特察夫(一八〇三——一八七三年)，是位俄國詩人。

(註八) 『奧涅金』中的一位主要的女主人公。性情幽靜剛良，是種忍受苦難的典型的人物。

(註九) 指當時的俄國彼得堡而言，彼得大帝建立此城時，稱這城是俄國『開向歐洲的窗子』。

(註十) 格萊布·烏爾本斯基(一八四三——一九〇二年)，他是著名的民粹派作家，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寫作，是一個指責小農和市民生活的詩人。七十年代後，隨著當時民粹派的『到民間去』的口號，開始注意農民的生活，寫成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土地的力量』，晚年死於癩病。

(註十一) 阿利和是愛爾蘭三世紀時的一位英雄詩人，曾寫過許多英雄詩歌。瑪克德爾松(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年)，是蘇格蘭詩人，曾寫過許多英雄詩歌，但和他共人及其作品，是否真實，尚存疑問。一個很大的問題，如約翰生即認其爲偽撰。杜里美(一八〇三——一八七〇年)，法國浪漫派作家，代表著作『卡門』、『高巴』，他在一八二七年寫了一本『古斯拉』詩集，他是採用法斯尼耶、克羅德亞、瑪瑪耶及奧爾文拉(俱係南斯拉夫一帶的地名)一帶的民歌，但實際上卻是梅里奧利用民歌而杜撰出來的。普式庚的『西斯拉夫夫人』詩集，亦即取材於此。又『古斯拉』，是種琴的名字。

(註十二) 『杜斯朗和傑德米娜』是普式庚在一八二〇年所寫的一首長詩，內容多採自民間故事，全詩的形式和語言，也是採用民歌體。其中敘述杜斯朗在結婚時，其新娘傑德米娜與爲妖魔劫走，後來經過歷經千辛萬苦，完成了許多英雄奇蹟，才從一個妖魔的手中奪回了新娘。

(註十三) 鮑長格(Lamias)，或稱抑揚格，是西歐詩歌中的一種普遍的格律，在一句詩中俱用一短一長的韻格。亞理士多德在『詩學』中認爲英雄史詩格爲最好，爲最堂皇，亦最深厚，而抑揚格等均不屬取。佛拉登派是十六七世紀比利時的一個畫派，以繪細光潔著稱。

從西南戰局說起

不能再後退了！

湘桂邊境敵軍犯桂林，粵桂邊境敵軍陷梧州、容縣，橫嶺北進，西南戰局緊急萬分，抗戰形勢已面臨嚴重危機。全國人民，盟邦人士都在密切注意戰局的發展，呼籲保衛西南，不能再往後退了！因爲如果繼續的後退，將使廣大反攻基地喪失殆盡，不但無以配合盟軍反攻，抑且連七年多抗戰的成就，也將化爲烏有。然而目前却有些論調，值得提出來談談。

「滇緬鐵路快通了！」

最近國軍在滇西打了兩個勝仗，攻佔了騰越和臘勐，敵守軍全部被殲。這的確是勝仗，是能令人振奮的，（被略）然而，如果因爲這勝利，而無意或有意地想使人們忘記湘桂粵桂的失利，那是得不到的。

目前有一種論調說，由於「滇西的大捷，滇緬鐵路快通了，中國戰線所需要的裝備等即可源源湧進，這是中國戰力的源泉，敵人塞不住這個源泉，就休想阻止我們將來的大反攻。」這種說法意思是說，滇緬鐵路一通，一切不成問題了。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們說的是，假如滇緬鐵路通了，那末我們的裝備給養，將能夠更多的取得盟國的援助，這對我們將來的大反攻是有利的，但是問題是在今天這條路還沒有通，還得我們配合盟軍用力量才能去打通，因此對今天來說，這還是一望無正「路」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聯盛頓觀察家的觀察，認爲「日寇正在向桂林推進，可能一直向西，這樣來使盟軍在緬甸的成就化爲烏有。」因此我們還是應該注意西南戰局。

「勝利決定於裝備」

敏

從滇西的勝利中，有些人就過份的強調武器裝備的作用。如說：「滇西之捷，主要是得力於裝備，因爲裝備比較優厚，志也提了。」因此向美國呼籲「爲配合盟軍反攻，中國戰線需要大量的武器，足夠的裝備」。有的在說明中國軍隊武器裝備太劣之後，更直率的說，「希望在滇西喪失反攻基地之前，就應獲得足以堅守基地之武器裝備的援助。」武器裝備，尤其是飛機大炮，對於現代戰爭是需要的。爲了配合盟軍的反攻，把日寇逐出亞洲大陸是極其需要優良的武器裝備的。我們希望盟國，尤其是美國，在這方面給予我們以極大的援助。我們相信盟國要求我們正在準備反攻，那末我們有權利向盟國要求加緊軍火援助，同時盟國也應該而且一定會予我們以更多的援助。但如果不認爲只有依靠足夠的武器裝備才能守住反攻基地，或者說打勝仗主要得力於裝備，因此呼籲盟國加緊援助，這是值得商討的。根據我們敵後作戰的經驗，沒有優良武器（被略）是仍然可以連打勝仗的，因此守得住守不住反攻基地，打不打勝仗，除了武器裝備優劣之外，一定另有更主要的東西。雲南晚報九月九日社論說得很好：「戰爭，不能單靠軍隊（應該補充：不能單靠裝備），就可以得到勝利，勝利的程度，是由人民動員的力量來衡量的。沒有人民配合作戰的戰事，是永遠得不到最後勝利」。一句話，要勝利，首先得打，要動員人民來打。抗戰初期的唯武器論決不應出現在今日西南戰事緊急之際。

「歐洲第一」的戰略要負責任

有些人在「自衛檢討」由於西南戰事的失利所造成的嚴重局勢之後，接着來個尾巴說：「這局勢也由於盟軍的「歐洲第一」的戰略所造成」，因此說如果「先打日本，那末中國戰事當然不是現在的

的決定，得偏重於從太平洋方面發動海軍的攻勢，直接向暴日本土開始攻擊。這樣一個決定，在目前可說是最切實而效率最快的。用海軍的力量去摧毀暴日的海軍，毀滅暴日的航運，用空軍的力量去破壞暴日的工業，使其既不能作海軍的防守，又不能從佔領地補充物資，更不能發展本身的生產力。這樣，整個暴日的作戰機構便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目前暴日所囑咐的「防衛本土」的口號，也必一無可施展之處，而同盟軍在暴日本土登陸的備軍，便成了一種水到渠成之勢，並且如此登陸，必然節省却不少的犧牲。」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爲這種論調，不但不是魁北克會議所決定的戰略，而且與魁北克會議的要求恰恰相反。如果說對北克會議是勝利會談的話，那末勝利的精神，就是我們中國用盡一切力量來解決盟國反攻暴日所遭遇的一切困難。

總之，「不論西方與東方，盟勝法西斯強盜的勝利已經迫近了。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快要來臨了，當前的國際環境是極端有利於我們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但是，無論如何有利，在中國戰場上的勝利，依然是要靠我們自己努力去爭取的。依照有利的國際環境，幻想盟國替我們打日本，袖手觀戰，保存實力，坐享勝利之果實，這不僅是無出息的妄想，而且是不可能的幻想。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決戰場所，是中國大陸，最後決勝力量是陸軍，不把日本陸軍殲滅，就沒有太平洋戰爭的最後勝利！不把日本軍隊完全驅出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真正解放，不備中國大陸是進攻日本基地，而且中國陸軍是擊潰日寇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沒有強大的有戰鬥力的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決不能最後擊滅暴日。」

「樣子了」。這話聽起來似乎，其實也不過是「先發制人」的舊調重彈。對於這，我們不必多說，祇要看看最近事實便可證明怎樣做才是更符合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要求的。這里更指出的倒是這說「法蘭西與「自力更生」的既定抗戰國策有背，在「自力更生」的國策下面，對外援助的態度，應該是「爭取」而不是「依賴」，因為我們抗戰主要是為了自己救自己，故得了救不了要問自己，不能責備人家，特別在抗戰局危急萬分之際，我們正應該好好檢討檢討自己的毛病所在，才能對症下藥，如果要「把責任推到盟國「歐洲」的戰時身上，那是不智之舉。因為這樣會使人忘記「求之在己」的道理的。

「以空間換時間」

前面說的那種人，也就是想把抗戰仗靠盟軍來解決，想把中國抗戰拖到盟軍在東亞大陸反攻及日寇時候來解決的人。他們主張「拖過這幾年，就是由中國基地大反攻日本的時候了」，「因此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保留相當力量，以備參加最後決戰。湘桂路的撤退，可以說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的運用」。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十分有害的，如果今天真的還要採用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那將會使抗戰走到什麼樣的道路上去。我們試一設想，這幾個月假使真是「拖」過的話，那末到那時反攻基地完了，即使美軍登陸中國沿海，也將感到極大困難，而且因為種種困難危機將會隨着空間不斷的喪失而增加，而終至不可解救。因此新報所說「今日，已再不是一用空間換時間」的時候了，而應該是以時間換空間」（九月十五社評）是十分正確的。

「敵人失却了戰略目標」

因為主張要「拖」，要「等」，而敵人又不肯氣喘喘命在進攻，於是這些人又出了一個奇怪的論

調，說「敵人在我國境內的進攻，已完全失却了戰略目標」。這個意思就是說不用怕，儘管敵人在我國亂竄亂打，其實還不是像個瘋子一樣的亂搞，毫無目的，毫無意義，不必去重視它。我們希望這些人把清楚，敵人不是瘋子，更不是笨蛋，他是準備有素的，此次從進攻豫湘開始，一直到最近湘粵桂邊界的進攻，都是在他明顯的戰略目標的。那只是在「勝主海潮」的總戰略下，企圖在中國大陸上打通一條交通運輸線，解決它海上運輸的困難，同時破壞我們的反攻基地，以便準備未來的大陸決戰

使盟友的援助不是虛擲

聞 芝

時間在逼人！形勢也在逼人！在西歐，反法西斯盟軍像風掃殘雲般已挺進到德國邊境，法西斯希特勒崩潰在即；而在東方，反法西斯戰爭却存在着嚴重的危機。正在這時，負有重大使命的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納爾遜與赫爾兩氏來華，與中國當局商榷怎樣才能運用中國抗戰，以挽救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危機，確是「既甚重要且甚迫切」的。

納爾遜先生執掌美國戰時生產重要職務，是戰時生產局局長。他指揮美國的生產戰線，督造美國的殺敵武器，發出了「一小時生產十五架飛機！」在最短的可能期間，壓服希特勒與日本」的響亮的號召，並使美國租借物資源源供應歐洲及東方戰場。赫爾將軍是美國有名的軍事情才，曾到過蘇俄、新德里、德黑蘭及莫斯科等地，並且參加過中英美開羅會議，會後到了德黑蘭，又復以臨時大使資格，擔任美蘇兩國間的聯絡工作，參加了德黑蘭會議。他們這次來華，使命確是十分重大。據他們在

挽救它的死亡。當然它這一戰略企圖，祇要我們真能加強作戰迅速和有效地予以打擊是可以而且必然會被打碎的。但如果我們忽視這一戰略的作用，而阿Q式的自欺欺人，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人民的呼聲

人民的呼聲是和上面一些人的論調完全相反的。人民的意見是反映着今天客觀現實的。目標祇有一個：停止敵人進攻，準備力量，配合盟國反攻；要求也很簡單：實行民主，加緊動員，徹底改革更張，使之適合新的要求。

招待本市中外記者席上的談話，這次來華訪問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們計劃如何在最短期間將日本擊潰」。留華期間的久暫，將看得到有助於中國的辦法之遲早而定。但我們希望這種任務的達成，愈快愈好」。納爾遜先生的任務在經濟方面，赫爾將軍任務在軍事方面。而兩位高賓連日經過與中國當局多次協商的结果，是「納爾遜局長所提出之全盤建議，均經主席採納」。而「在此全盤建議中，已有一具體計劃」。並且「美國今後空軍將係供應中國所急需而不能生產之物資。縱使中國因被敵侵略而喪失甚多重要物資，以及遭受長期封鎖之壓迫，但仍決心在生產方面增加對戰爭之貢獻」。同時「中英為迅速擊潰暴日，對中國目前可用之工業產力，作更充分之利用」。以上是關於經濟及軍事方面。至於軍事方面，「赫爾將軍尙留華若干時日，商談關於軍事部份」。但來亦必有許多重大決定。這些消息，自然值得我們欣喜，這不僅表示中英兩國間的合作，而且也表示美國盟友關懷我國

他其及布霉

芬卓

在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世界鬧着大恐慌的時候，有些國家把大批的咖啡，牛奶倒落海裡，把麥子當燃料燒。這顯人聽聞的故事，是因爲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形成了生產過剩的結果！

誰能想到今天的中國，在物產缺乏，生產過剩的情況下，竟有着價值近四萬萬元的布，幾達十個富足的國家在等着去變紙，甚至幾萬噸的棉花也過不成兩斤花紗布管理局的布在囤積，但是許多多人在囤積布，買不起布，買不到布，在都市，在鄉村，我們可以看到一般公務人員，小市民，穿的衣服都是破爛的，不是從舊衣服，大改小的，就是從外洋打來的破爛衫，能够穿到穿的平布的中山裝已經是不起碼的了。至於那些貧窮的書生和工廠的工人更是不敢穿，或者穿衣褲在受凍。

布布突在參政會中被提議出來了，最引人注意的莫如黃炎培和鄧飛賓兩先生的詢問。黃先生在羅列于之發說：「花紗布局近來欲布應市，實際仍是有貨囤積，從前是人民囤積，現在是政府囤積，官吏囤積，多數公務員苦，多數官吏更苦財」。鄧先生提了一個動聽的詢問：「花紗布管理局所存的布，已堆積了許多，價值三萬萬六千萬之多，這筆損失他們一點也不管，因爲用漲價，每段布尺頭縮少數寸或幾寸布充好布混出等辦法，已經毫無困難可以

抗戰局勢的深切，和恢復經濟的決心。我們要在抗戰局勢的深切，和恢復經濟的決心。

但是，經濟日，主要是要求中國大陸上的決戰，雖然美國國務院宣佈，德國失敗後，國庫的主力將由美軍接管，美軍將對太平洋，以確保保護民主主義公理的區域。海軍部則也有對德審判。在日本失敗以前，美海軍不派官員，遠東的航線，與其認爲減輕海軍的負擔，無寧認爲使海軍負起新的任務，以對日實施更大的打擊。美國也曾一再表示對日本到底。但「在執行聯軍日本共同任務中，中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並且「尼米茲曾對上海以北基地的意義」，「尼米茲曾對上海以北基地的意義」。然而今天中國大國的形勢，迄今尚未脫離失利的時期，而一旦日本打過海峽，把中國割成兩半，其可能隨中國東部海岸的地方，美軍將來可能在中部海岸附近登陸，這將使中國加不少困難（華盛頓觀察家）。爲什麼中國軍隊迄今尚未脫離失利的形勢呢？有些人回答是：軍隊訓練的設備太差，距離現代戰爭應有的條件太遠。這是一個缺乏現代訓練的軍隊，能擊退強大的敵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便希望兩位高貴來解決中國武裝裝備問題，和增加對敵動員供應問題，甚至有人希望聯軍將領在我們這邊長期作戰，直到打到東京。

當然，朋友對我們更多的武器裝備和物資供應方面的幫助，我們是非常歡迎的，我們也應該努力去爭取。但也正如新報所說：「抗戰建國究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不能事事存依賴之心，我們應該自己努力，努力改正自己的弱點，努力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並且優良的裝備固然十分重要，但也不能過調唯武器論，不能借此掩蓋戰爭失利的真正原因，事實也證明，在我國敵後各戰場上的軍隊，也並沒有優良的裝備，但仍舊經常在那裡打勝仗，經常在那裡阻止敵人進攻，經常粉碎敵人的掃蕩，頻頻傳來勝利的捷報，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缺乏優良裝備的軍隊，去擊退強大的敵人，並不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沒有優良裝備，如果沒有的壯力健，忠勇爲，如這是以民生而戰的人，又如何能打勝敵人？」

因此，當這兩位高貴來使地無波五件而來和中國「計劃如何在短期間對日本實施」的計劃，當內戰動員動員時，如這東部，這是一元，這是一元的精華」的時候，中國（被難）是應該被鼓勵了。

時間在逼人！形勢也在逼人！

中國爲了使朋友的援助不長虛傳，爲了阻止敵人的進和粉碎它的救死與，爲了回給朋友的企望「在短期間擊退日本」，走向勝利之路，只有立即積極準備反攻，以便配合敵人的反攻，只有立即實行村中壯生所指示的真真正正爲主的民主政治！表發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財力到抗戰中來！

這我們的希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也是朋友對中國的希望！

木刻封面未刻

彥涵作：「當敵人搜山的時候」

的時候

完全喚不到火藥氣息看不到任何戰爭活動的學校裡讀書，這已經可以說是有礙了……

這不為人民所需要的「奇蹟」，給我們這位專家解釋為「國家對於智識青年的優遇」。其「特殊優遇」的結果，當然只有使得被關在學校裡的青年學生入於銷沉了。這責任總不該讓青年學生來負吧！但這位專家又認為學生不聽話，不立即什麼什麼的，又責罵青年學生：「盡在智識的屯積居奇……一方是沒有了過去封建士族的美德，另一方即享受著比過去士族更多的特權；」所以他武斷的不顧事實的說：「我們青年學生對於抗建的真誠比起各國的青年學生實有遜色……大部份則并未稍盡其為國民一分子的責任……」

那裏？青年學生既如此不用，應該怎麼辦呢？且看專家的指示吧！「現在筆者敢正告作為智識青年的學生：在我國一般人智識水準還不很高的今天，青年學生應是國家最有力的支持者，現在數在百萬以上的青年學生，如果能為國家盡力，那就本論用力到什麼地方，都必然能夠發揮其百萬雄師的力量。」

問題倒清楚了，歸納起我們這位專家的意見來，不外兩點：
第一：青年學生沒有稍盡其為國民一分子的責任。
第二：今後應為國家盡力。

關於青年學生過去對國家沒有盡力或者盡力得很少的說法是不公平的不顧事實的昧心之談。人們總不會忘記吧！總不會把近三十年史實加以選擇吧！試問反對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賣國協定因而掀起五四運動的是誰？不是青年學生嗎？（被略）我們更可以回憶一下，當一九三七年抗戰伊始時，許多青年學生都熱烈地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抗戰，或服務軍隊，或參加其他各種志願服務團體。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漢以及其他各個城市裡都可以看到東一堆西一堆的青年學生在作抗戰宣傳工作。在前線在後方在各種抗戰的崗位上，都可以看到青年學生在勇敢而毅地為抗戰的祖國貢獻出了他們的力量，表現了很大的成績，這種種犧牲的事實尚鮮明地印在每一個中國人民的腦子裡和心坎上，誰能

加以一筆勾銷呢？這是辦不到的。

但以後青年學生們的確是銷沉了些了，那是：「這些在軍中工作的人們感覺幻滅了，熱情工作者的自願組織受了挫折，（被略）」的原故，那是沒有完全實行「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之指導原理的原故，這責任應該由誰來負，是再明顯沒有的了。

的確，目前的祖國正面臨着空前未有的驚濤駭浪，青年學生應該在這個時候動起來了，但是，我要求來正告青年學生為盡力的入們：不是青年學生不為國家盡力，而是立即澈底澈除你們所佈置的重重障礙，使得他們能修習完備，求從各方面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這就必須實現以下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立即改正現行教育政策、方針和制度。實施抗戰教育。因為只有這樣之教育，才能適應抗戰時人材幹部的需要，大批地而迅速地培養出來。我們實地了困難教育以後，在宣傳鼓動羣衆積極地參加抗戰方面，我們便可以獲得成千成萬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幹部；在組織羣衆英勇地參加抗戰日戰線上來，便可以湧現我們所需要的組織人材。至於抗戰時期為了適應抗戰所需要的各部門的新人材，來代替那些舊的腐朽的分子，當然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

第二：立即明令宣佈學生民主自由的權利。這一方面使得學生有思想、言論的自由，對抗戰有關的問題能自由發表意見，進行討論。另一方面使得學生有組織活動的自由，可以組織各種各樣的研究會，歌詠隊、戲劇、對民衆進行抗戰宣傳活動的自由。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學生的自動性、積極性發揮起來，參加抗戰工作是有無問題的。
假如說以上兩個條件不實現的話，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實在無法發揮百萬雄師的力量」。被略）祖國已面臨着危險的局面了，我們的青年學生應該不存任何幻想，積極地團結起來爭取民主政治在全國範圍內的實現；民主教育的實施才有可能。

九月二七日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 第五號... 伍號

羣衆

第九卷 第十九期

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新華日報館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地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八元
六期	四十四元
十二期	八十元
第四期	百五十二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本刊稿件奉命全部事前送審，本期並已取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回執

本期零售八元